

臺灣之於「東洋協會」的歷史意義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between Taiwan and ToyoKyokai

林 呈蓉* · 荒木 一視**

LIN, Chen-Jung, ARAKI Hitoshi

Abstract

Toyo Kyokai (東洋協會) was a culture organization which was established in 1907, and disbanded in 1945. But saying with accuracy, it didn't be buil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truth is it was reorganized from Taiwan Kyokai (臺灣協會) which was established in 1899. This article uses Tokyo Kyokai as a case study trying to analyze the role of culture organization on diplomatic policy of Japanese government during the late modern period. Through this subject researching, we found that Taiwan societ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an we imaged.

With analyzing the rise and fall of Toyo Kyokai, it would make clear to understand culture groups in the late modern period how to affect national diplomacy 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well as what is the core competence of Taiwan within East Asia, and the whole world.

前言

「南洋道」構想之緣起

1908年(明治41)12月,日本帝國議會第25次議會開議中,有議員提出設置「南洋道廳」構想,意外地引來琉球社會輿論的撻伐、批評而作罷。¹所謂「南洋道」構想之緣起,主要是從沖繩縣稅入不足的問題著眼,有識者建議把殖民地台灣與奄美大島等一起納入沖繩縣管下,以有效減輕沖繩之於日本政府的財政負擔。而之所以意圖把台灣納入沖繩縣管下,是覬覦台灣的財政價值。事實上,早自1904年(明治37)在日俄開戰的契機下,日本政府國庫補助金便不再接濟台灣,台灣的財政開始朝往獨立自主路線發展。²因此,當設置「南洋

道廳」之構想被提出時,當時的沖繩縣知事奈良原繁是樂觀其成的。

然而,設置「南洋道廳」的消息一傳出,卻引發沖繩社會的軒然大波。以「琉球新報」為首發表社論〈台灣直轄論〉,嚴正反對這項做法。翌年(1909)1月,「南洋道」構想計畫乃無疾而終。事實上,從社會經濟的觀點考量,沖繩人的行動半徑與台灣社會,息息相關。1945年(昭和20)日本結束在台殖民統治時,有三萬名沖繩人從台灣回到了本籍地,但更有為數不少的沖繩人繼續留在台灣。

到底沖繩社會之於「南洋道」構想的潛在隱憂是什麼?1903年(明治36)日本舉辦第五屆內國勸業博覽會,當時在「人類館」展示日本帝國領域內非「大和」文明者,即北海道的

¹ 新城俊昭《高等學校琉球・沖繩史》(沖繩歷史教育研究會),日本那霸,2002年2版,頁175。

² 若林正丈編《矢原原忠雄「帝國主義下の台灣」精讀》(岩波書店),日本東京,2001年初版,頁237。

* 淡江大学文學院

** 山口大学教育学部

蝦夷人、台灣的「生蕃」，以及沖繩人，而引發沖繩人的強烈不滿，即沖繩史上所謂的「人類館」事件。換言之，沖繩社會擔心「台灣直轄」的結果，會導致沖繩的殖民地化；但更甚的是，過去沖繩之於日本帝國所扮演的「南門」角色，恐會被台灣所替代，沖繩社會之於帝國的存在價值，將被日本社會所漠視，進而喪失主體性。³

現實上，即使台灣之於日本帝國依舊是殖民地，但伴隨歲月的推移，近代日本之於台灣的經營卻愈顯重要。台灣總督府第一任民政長官水野遵自詡，台灣之於日本帝國的重要性，猶如和風庭園裡的石燈籠，唯因日月推移而長出青苔，才能更顯雅致與古意。⁴

另一方面，當1908年（明治41）台灣之於「南洋道」的相關問題吵得沸沸揚揚之際，事實上，早於前一年的1907年（明治40），1898年（明治31）成立的「台灣協會」為因應新時代的來臨，改組為「東洋協會」。

無論是「南洋道廳」之設置、抑或是「台灣協會」的改組，以一言蔽之，其背後皆與1905年日俄戰爭之獲勝息息相關，近代日本「與萬國對峙」之夢想將指日可待，而日本之於東亞社會的國際地位，則需從台灣之於日本帝國的定位開始，重新布局。

國策外圍團體的始作俑者：水野遵

眾所周知，「台灣協會」的成立需歸功於台灣總督府的初代民政長官水野遵。1897年

³ 又吉清盛〈台灣殖民地と沖繩の關かわり〉（收錄於《岩波講座《近代日本と植民地》月報2，岩波書店》，日本東京，1995年6月，頁3。

⁴ 〈水野遵氏の台灣談〉（收錄於《台灣協會會報》第11號），1899年（明治32）8月，頁72。

⁵ 大路會編《大路水野遵先生》（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藏），1930年（昭和5）復刻版，頁117。

⁶ 前揭《大路水野遵先生》，頁85。原文為「台灣占領の原意は武備よりも富源の開発の方に傾いて居る」。

⁷ 前揭《大路水野遵先生》，頁85。原文為「何となれば、世界の風潮に順応し、此台湾を以て或場合には全く帝國南門の藩屏と為し、之れが為には一時は商工を放擲しても、専ら軍事上の用に供せねばならぬ時機が到来せぬとも限らぬ」。

⁸ 前揭《大路水野遵先生》，頁101-103。原文為「今日の海外貿易は放逸である、冷淡である。思ふに前時代の台湾政府が、海外貿易を奨励する迄に政府自身が進んで居らない、（略）是れは暫く放任して置く積りである」。

⁹ 前揭鶴見祐輔《正傳 後藤新平3》，頁405。

（明治30）7月，水野遵離職之後，仍心繫台灣。如何讓日本的本土社會與台地相連，甚至從台灣延伸至南清，更是水野對台灣之於帝國角色扮演的擘劃與理想。離台後的水野遵（幹事長）乃與二代總督桂太郎（會頭）、大倉喜八郎（會計監督）、田川大吉郎（幹事）、三枝光太郎（幹事）等台灣經驗者協同組織一文化團體「台灣協會」，意圖成為強化日、台兩地交流的橋樑。⁵而「台灣協會」亦成為奠定日後「東洋協會」的發展根基。

到底台灣之於近代日本、甚至東亞社會，扮演如何的角色？溯本清源，即水野遵所謂的「台灣佔領的原意，與其說是著眼於國防意義，不如說更傾向於島內富源之開發」。⁶

而「無論是順應世界強權擁有殖民地之風潮，抑或是為了作為帝國南門之屏障，台灣的未來絕非僅供軍事方面之所用，而棄工商業發展於不顧」。⁷然而，在對外貿易方面，水野遵則感嘆「目前政府之於海外貿易，則呈放任、冷漠態度。但回想起過去在台灣的政府，其本身亦對獎勵海外貿易並不挺進」，於是「這個部分就暫時順其自然發展」。顯然，在水野遵的主導下，台灣社會對外貿易之發展，依舊走保守路線。⁸

即使水野遵從產業經濟的觀點，注意到台灣社會之於海外貿易所潛藏的可能性，但日本治台初始之際，在欠缺鐵路、電信、郵遞等近代社會所應具備之軟硬體設施等情況下，地方商人儼然已成為社會經濟的專制君主，⁹而這

亦是水野遵對台灣之於海外貿易等議題採無為而為之主因。

因此，儘管台灣社會商機無限，但商利僅受惠於少數的商人階層，絕大多數的民眾則以農民身分，被勞役剝削。¹⁰而這種現象得等到第三代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來台履新，推動產業革命，才得以使民眾將私藏土中之銀貨拿到市場流通，台灣之於日本本土的移出入貿易，以及對南清與南洋的轉口貿易乃變得活絡起來。¹¹由此得以推知，台灣之於近代日本、之於東亞世界的定位，最終將以資本輸出入中心的角色，活躍於近代的歷史舞台。

除了與東洋協會的發展密切關連的拓殖大學百年校史編纂室之外，¹²過去對於「台灣協會」、抑或是其後的「東洋協會」之研究並不多見，本文以幾位學界先進如山根幸夫、河原林直人、Hyung Gu Lynn等諸氏之研究成果為基礎，輔以相關史料，試從「東洋協會」之發展脈絡思索台灣之於東亞的定位。

第一章、「東洋協會」的母體：「台灣協會」

一如前述，1897年（明治30）7月，水野遵離開民政局長一職，回到日本本土。同年12月，因治台有功而被勅選為貴族院議員，以為酬庸。然而，離職後的水野遵仍心繫台灣，為促使日本本土與台灣社會能相互連動，有效開發台灣的經濟富源，水野遵乃主動邀約一些有

台灣經驗之日裔人士組織「台灣協會」，並親任幹事長，主導台日社會間的雙邊交流。

根據《台灣協會會報》第一號所載水野遵的演說〈台灣協會の經過に就て〉，內容清楚說明水野認為「台灣協會」有其成立之必要的緣由。而其必要性無他，主因於日本治台雖滿三年，但水野深感日本本土之於台灣的社會實態，既不關心且一無所知。除了三井物產會社已有涉足之外，台、日兩地間的物產如何搬有運無，甚至懂得透過台灣作為跳板，讓日本商界進軍對岸的福州、廈門等，對當時一般日本企業而言，所知闕如。¹³因此，水野遵主張應於台、日兩地之間成立「台灣協會」之類的平台機構，以為合赴任官員在內之人流、物流等往來互動之橋樑。¹⁴

不容諱言地，台灣統治的最大困難，莫過於不通言語的問題。在水野遵的構想下，「台灣協會」可協助日裔人士習得台語，以方便他們前往台地赴任、或開創事業；同時，亦可透過「台灣會館」之設立，為甫至日本的台裔子弟或商務人士，提供住宿及其相關資詢服務。¹⁵

而前述水野遵所言之「台灣協會」成立之經緯與思考內涵，則成為日後〈設立台灣協會主意書〉¹⁶之主旨。水野遵強調「台灣協會」的存立完全立基於實業層面，而無關政治；至於相關之人會資格，除了有台灣經驗之日方紳士、貴顯外，更希圖台裔人士能參與其間。¹⁷

事實上，水野之所以為「台灣協會」之成

¹⁰ 前揭鶴見祐輔《正傳 後藤新平3》，頁406。

¹¹ 前揭鶴見祐輔《正傳 後藤新平3》，頁407-408。

¹² 「東洋協會」與「臺灣協會」之相關研究有拓殖大學創立百年史編纂室編《東洋文化協會五十年史稿》（拓殖大學，東京，2011年）、同《拓殖大學百年史・明治編》（拓殖大學，東京，2010年）。

¹³ 水野遵〈台灣協會の經過に就て〉（收錄於《台灣協會會報》第一號，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藏），1898年（明治31）10月20日，頁14-15。依1899年（明治32）4月10日『大阪每日新聞』所載，「台灣會館」坐落於舊東京龜町區內幸町，由原「華族會館」改建而成，詳細內容亦收錄於《台灣協會會報第七號》（1899年4月20日）。

¹⁴ 前揭〈台灣協會の經過に就て〉，頁15-17。

¹⁵ 桂太郎〈台灣協會の設立に就て〉（收錄於《台灣協會會報》第一號，1898年（明治31）10月20日，頁3。

¹⁶ 〈設立台灣協會主意書〉（收錄於《台灣協會會報》第一號），1898年（明治31）10月20日。

¹⁷ 前揭〈台灣協會の經過に就て〉，頁20-21。

立而積極奔走，則與1897年（明治30）「高野孟矩事件」¹⁸背後台灣總督府官員所引發的吏治污職有關。水野遵本人亦因而被牽扯其中，遭致免職處分。¹⁹一如〈設立台灣協會主意書〉之所述，台灣的經營「未得方針定說，眾心茫乎」。對一生的官途仕運與台灣緊密連結的水野而言，他應該看到，且已經看到了台灣之於日本帝國的重要性，因此在〈設立台灣協會主意書〉中強調，「台灣之地也，土壤膏腴，地勢險要，千海千陸，產物豐饒，內足而可給於外，此天放之形勢，可以固近，可以威遠，誠東洋之咽喉，實我南方之富源也」，而這一段話則一語道破台灣之於東亞、之於日本帝國，在地理位置上的重要性。

為了讓那些社會多數的「不識所向之輩」，深切理解台灣在軍務、殖產、工業、與對外貿易等層面，之於日本帝國有其絕對正面的意義；又讓台灣社會三百萬民眾能為天皇之盛德而謳歌，「台灣協會」則有其存立之意義與價值。²⁰

1899年（明治32），水野遵力主下所成立的「台灣協會」，除了東京之外，亦開始在日本本土各大樞紐城市設立分會。該年10月2日的〈大阪朝日新聞〉刊登一則有關「台灣協會」的訊息，內容強調該會為了提供台商因貿易、投資而屢屢出入日本本土之利便，打算在神戶、大阪、京都、名古屋等設有協會分會等地區，設置提供台人住宿之施設，以避免台商為了住宿地點，遭致不親切待遇，進而對日本社會產生不快之念，甚至間接影響台灣社會經

濟的繁榮發展。²¹

換言之，水野遵把其之於台灣社會的期待，以及為促進台日間相互提攜之理想，直接寄望於「台灣協會」的角色扮演上。然而，眾所周知，該協會成立之後未久，就在壯志未酬情況下，1900年（明治33）6月，水野遵因腎臟病去世，享年51歲。²²

第一節 「台灣協會」成立之經緯

從「台灣會」到「台灣協會」

1897年（明治30）以台灣經驗者或關係者為中心，組成一個舊情重溫的親睦團體，稱之為「台灣會」，每年聚會一次，²³而這個構想依該年4月16日〈東京朝日新聞〉之記載，「台灣會」的成員多為領台初期便渡航來台之軍人、政治家、學者、實業家、媒體記者等，他們之間的共通點就是擁有篳路藍縷時期的台灣經驗。

翌年（明治31）3月5日，「台灣會」部分成員提議，應成立一個拓殖經營之相關諮詢機構。從成立一「拓殖經營上可資之機構」的建議，進而衍生出設立一個在總督府的台灣統治上能扮演協助角色的團體，而這個提案隨即受到在場多數人士贊同，並當場選出了創立委員，包括水野遵、大倉喜八郎、三枝光太郎、田川大吉郎、加藤政之助、野村政明等人。但因水野遵於領台以來，便任職於總督府，可謂是最精通台灣情事者，眾人乃決議在新設機關中委請他扮演總幹事之類的推動者角色。²⁴

¹⁸ 三代總督乃木希典來台赴任時，為革新台灣總督府的吏治問題，乃雷厲風行糾舉汙職現象，雖立意良善，卻使單純的司法案件演變成政治問題，以當時的民政局長水野遵為首，多位總督府高層都被牽扯在內，甚至引發日本帝國憲法是否適用於台灣社會的爭議。由於在做法上有些部分顯得牽強而不盡情宜，台灣史上初代高等法院法官高野孟矩自己也慘招被罷免的命運。

¹⁹ 前揭《大路水野遵先生》，頁116。

²⁰ 〈設立台灣協會主意書〉（收錄於《台灣協會會報》第一號），1898年（明治31）10月20日。

²¹ 前揭《大路水野遵先生》，頁124。

²² 前揭《大路水野遵先生》，頁140。

²³ 山根幸夫〈台灣協會の成立とその發展：日本植民政務の一側面〉（東京女子大學附屬比較文化研究所紀要《比較文化研究所紀要》第36卷），頁50，1975年。

²⁴ 前揭山根幸夫〈台灣協會の成立とその發展：日本植民政務の一側面〉，頁50。

事實上，當時以台灣為名的民間團體，除了前述「台灣會」之外，以「台灣協會」為名的團體有二：一為1897年（明治30）10月成立，以滯台日本人官民有志者等為主，為促進台灣與日本本土之間氣脈相連所成立的「台灣協會」，但從未舉辦過任何活動；另一則是以有台灣經驗，抑或是曾在大清留學者為中心，以從政事或學術角度研究台灣為目的而設之「台灣協會」，雖號稱有百人會員，但亦從未舉辦過任何活動。²⁵

待前述「拓殖經營上可資之機構」而有設立「台灣協會」之議，既存的兩個「台灣協會」乃合流，同年（明治31）4月2日，則依前述決議而有日後眾所周知的「台灣協會」成立，並在九州俱樂部舉行新的「台灣協會」發起式；並於同年（明治31）7月19日，在評議會中推舉桂太郎為創會會長。²⁶依東洋史學者山根幸夫之所見，推舉二代台灣總督桂太郎為會長，係因桂會長出身軍職，其背後之意圖及其表徵，在於「台灣協會」的存立價值是跳脫泛「政治」化之框架。²⁷

桂太郎為能有效取得來自實業界的認同與奧援，乃竭盡所能地招募東京或橫濱一帶之有力實業家入會或金援。而除了台灣之外，「台灣協會」亦積極在大阪、神戶、京都、名古屋等地設立支部，終極目的皆是求得日本本土實業家在資金上的援助。²⁸

在桂太郎的認知上以為，「若是僅以舊官吏，抑或是論客等組成台灣協會，即使協會成員能接受本人的理想，但終歸還是淪為畫

餅罷了，更難保僅流於一政論團體而已」；而協會基礎的鞏固與否則仰賴資金之有無，為有效獲取資金，首要之務莫過於尋求實業家之奧援。²⁹因此，1898年（明治31）「台灣協會」成立的同年9月，會長桂太郎相繼在16日與19日，親自在日本東京的陸軍大臣官邸招待東京、橫濱紳商，向有經濟實力的財經界人士募款，期盼共同為今後台灣社會的開發提供助力。³⁰

翌年（明治32）4月，桂太郎會長又以陸軍大臣身分前往日本關西地區，利用巡視各新設師團之餘，分別出席了大阪支部（8日）、神戶支部（9日）、京都支部（11日）、名古屋支部（15日）的成立大會³¹。然而，不同於台灣支部以闡揚台灣社會實態為要務，日本本土各支部的角色扮演，則以向實業家爭取資金奧援為要務。「台灣協會」透過日本本土京濱、關西、名古屋等各地財經界，而結構出一套協助與支援體系。³²換言之，「台灣協會」的自我定位在於結合政界與財經界人脈，協助日本殖民地擴張政策有效發展、推進之一政府外圍團體。³³

而「台灣協會」存立之課題則在於，理解台灣、促進台日交流、支援台灣殖民地經營，包括培育殖民地經營人才、蒐集有益情報、向日本本土社會傳達台灣之於日本帝國的重要性等。根據前揭『台灣協會立趣書』之內容顯示，「台灣協會」的成立趣旨可歸納出以下兩點：其一，台灣在地理上的便利性與資源上能否有效運用，與日本帝國的國益增進緊密相結。換

²⁵ 前揭山根幸夫〈台灣協會の成立とその発展：日本植民政策の一側面〉，頁50-51。

²⁶ 河原林直人〈東洋協会における南洋への関心について：1910年代を中心に〉（Discussion Paper No.77），名古屋学院大学総合研究所，2008年9月，頁2。

²⁷ 前揭山根幸夫〈台灣協會の成立とその発展：日本植民政策の一側面〉，頁51。

²⁸ 前揭河原林直人〈東洋協会における南洋への関心について：1910年代を中心に〉，頁4。

²⁹ 前揭山根幸夫〈台灣協會の成立とその発展：日本植民政策の一側面〉，頁54。

³⁰ 前揭山根幸夫〈台灣協會の成立とその発展：日本植民政策の一側面〉，頁54。

³¹ 前揭山根幸夫〈台灣協會の成立とその発展：日本植民政策の一側面〉，頁56-57。

³² 前揭山根幸夫〈台灣協會の成立とその発展：日本植民政策の一側面〉，頁57。

³³ 前揭山根幸夫〈台灣協會の成立とその発展：日本植民政策の一側面〉，頁49。

言之，台灣經營的成就與否將左右日本帝國的未來發展；其二，經濟發展是台灣經營的要件之一，因此配合經濟發展的環境整備則成為台灣協會所追求的重要指標。「台灣協會」不可固步自封，而必須與台灣總督府的政策目標相互協調。³⁴

1899年（明治32）5月28日，「台灣協會」召開第一次總會，出席人數超過300人。當時的會員人數共1410人，而台灣支部便佔了半數的732人。當時該協會為招募會員，除了在台灣推動強勢宣傳之外，且從名譽會員名單中，清一色是首相經驗者、歷任台灣總督、或是日本政界大員，其背後意圖一掃日本國民大眾普遍認為領有台灣是「無用」的刻板印象，平息批判政府領有台灣的雜音，可想而知。³⁵

「台灣協會」相關設施的立意宗旨

「台灣協會」甫成立未久，1899年（明治32）4月10日〈大阪每日新聞〉登載一篇題為〈台灣協會的施設〉之評論，³⁶充分展現出日本社會之於「台灣協會」的存立需求與期待。評論中強調，日本社會之於台灣的理解，多數時候都充滿誤謬印象，因此當務之急有三，其一、透過《台灣協會會報》正確地介紹台灣社會風土、人情等實態；其二、投台灣產業之所需與民眾之所好，蒐集日本本土商品轉賣地；其三、為求兩地民眾相互往來之便利，除了在兩地設置支部，提供正確資訊之外，更應設置如「台灣會館」等機構，以方便滯日台人住宿之用。另外，除了發行會報，亦應經常召開講談會，向會員介紹台灣社會的在地狀況；收集台

灣情報等相關書籍，提供彼我參考；對滯日的台裔留學生行輔導與補助之責，以協助彼等知識之開拓。³⁷

依「台灣協會規約」之所記，「台灣協會」成立之根本目的，即規約第一條「裨補台灣之經營」，而其前提是「闡發台灣之真相」，啟蒙日裔人士之於台灣的認識。換言之，該協會定期出刊之月刊《台灣協會會報》，³⁸是提供台灣情報的一份重要參考，特別是針對經濟議題等相關資訊。³⁹

1898年（明治31）10月創刊之月刊《台灣協會會報》之於「台灣協會」的角色扮演如下：⁴⁰

(1) 是提供台灣相關情報之媒體，內容則以評論或產業介紹佔多數頁面。換言之，在台灣開發問題上展現出高度關心。

(2) 會報內容的執筆者多為台灣總督府或台灣銀行等相關人員或官僚，透過文字傳達行政部門之問題認識與見解。換言之，《台灣協會會報》亦成為台灣總督府意識的傳聲筒。

(3) 依《台灣協會會報》之內容分析，「台灣協會」與其說是一民間團體，不如說是台灣總督府的外圍團體，抑或是御用團體，則比較接近事實。

依東洋史學者東京女子大榮譽教授山根幸夫氏之所見，當時「台灣協會」委請擁有東京帝大文學士背景的河合弘民擔任《台灣協會會報》編輯主任，協會成員對《會報》之於協會的深切期盼，則可見一般。⁴¹

「臺灣協會」的各種文教事業中，必須一提的莫過於對臺灣內地留學生的輔導與監督，

³⁴ 前揭台灣協會誌〈設立台灣協會主意書〉（收錄於《台灣協會會報》第一號），1898年（明治31）10月20日。

³⁵ 前揭山根幸夫〈台灣協會の成立とその發展：日本植民政策の一側面〉，頁58。

³⁶ 〈台灣協會の施設〉（收錄於《台灣協會會報》第七號），1899年4月20日，頁83-84。

³⁷ 參照前揭〈台灣協會の施設〉。

³⁸ 月刊誌《台灣協會會報》創刊於1898年（明治31）10月，現藏於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

³⁹ 前揭山根幸夫〈台灣協會の成立とその發展：日本植民政策の一側面〉，頁53。

⁴⁰ 前揭河原直人〈東洋協會における南洋への関心について：1910年代を中心に〉，頁34。

⁴¹ 前揭山根幸夫〈台灣協會の成立とその發展：日本植民政策の一側面〉，頁54。

除了安排住宿之外，更提供聾啞學生學費補助。初起之際，有臺灣留學生楊生英、郭主恩、古金相，以及陳中和的八名子弟等受到照護，而多數學生都被引介至慶應義塾就讀，1904年（明治36）以後則多被安排至臺灣協會學校別科就學。⁴²

「台灣協會」的台灣支部

桂太郎會長除了向東京、橫濱紳商尋求資金與援之外，更要求台灣當地的財經界人士協助相關資訊之提供，因此當前之急務，莫過於在台灣亦設立支部。

早在1898年（明治31）8月，便由台灣當地官民有志者等提出入會申請，經數次開會協議之後，支部的設置終於定案，並於同年12月13日，獲得本部同意在台設置支部。⁴³而台灣支部的任務與東京本部雷同，皆以闡揚台灣社會之實態為要務。⁴⁴

對於台灣協會在台支部的成立，台灣社會亦寄予深厚期待。1898年（明治31）11月13日，〈台灣日日新報〉上出現一篇題為〈台灣協會支部設置に付〉的評論，其內容強調「台灣協會」存立的目的不僅有其政治上的意義，對於台灣經營亦有其可資仰賴之處。因此，在台灣本地設立支部，對於「台灣協會」成立的終極目標，更能有效發揮強化推進之效果，特別是對於台灣經營所需資訊之調查、收集流傳於台灣社會荒唐無稽等謠言蜚語等，藉以啟迪日本本土官民，俾使「台灣協會」之決議能成為台灣社會政治輿論的重要指標。⁴⁵

1899年（明治32）1月29日，「台灣協會」

台灣支部成立，除了支部長後藤新平、幹事長石塚英藏，幹事木村匡、松岡辨、大島邦太郎、守屋善兵衛、木下新三郎等五名⁴⁶等之外，另有一般會員，人數超過614名。⁴⁷在臺灣支部的成立大會上，臺灣在地的仕商代表李秉鈞則發表談話，以「自今而後，舉凡吏治之得失，風俗之存疵，民生之休戚，文獻之存墜，習尚土宜之異同，皆將推闡明瞭，曲暢旁通，度幾贊助總會，共宏厥旨，而臺島三百萬人民，共帖冒於大化之中，漸摩於新政之下」，顯見臺灣社會對於協會支部之於文化事業的期待。

同（明治32）11月，協會的臺灣支部發表〈臺灣支部告白書〉，以「闡發臺灣社會真相，裨補臺灣經營為目地」為己任。⁴⁸支部之事業內容如下：⁴⁹

- (1) 整合在臺蕃情研究會、臺灣文庫等資源。
- (2) 派遣視察員前往島內各地。
- (3) 在《臺灣協會會報》中另闢漢文欄。
- (4) 提供日本內地觀光者旅費補助。
- (5) 購買圖書提供公眾閱覽。

而致力於社會文化提升的「臺灣文庫」，原本坐落於淡水館，其後輾轉移至臺北府後街的天后宮、大稻埕六館街林本源的持屋，最後則於1914年（大正3）寄贈給臺灣總督府圖書館；《臺灣協會會報》則於1910年（明治42）1月改以《臺灣時報》出刊，1919年（大正8）7月，則交付臺灣總督府旗下的臺灣時報發行所出刊；至於內地留學的學費補助，自1911年（明治43）開始僅限東京高等工業學校學生適用；不過，最引人矚目的是，配合1902年（明

⁴² 拓殖大學百年史編纂室《東洋文化協會五十年史稿》（拓殖大學，2011年3月），頁96-100。

⁴³ 前掲山根幸夫〈台灣協會の成立とその発展：日本植民政策の一側面〉，頁55。

⁴⁴ 前掲山根幸夫〈台灣協會の成立とその発展：日本植民政策の一側面〉，頁56。

⁴⁵ 參照〈台灣協會支部設置に付〉（收錄於《台灣協會會報》第3號），1898年（明治31）12月20日，頁73。

⁴⁶ 前掲山根幸夫〈台灣協會の成立とその発展：日本植民政策の一側面〉，頁56。

⁴⁷ 前掲河原林直人〈東洋協会における南洋への関心について：1910年代を中心に〉，頁4。

⁴⁸ 〈臺灣支部告白書〉（《臺灣協會會報》第15號），1899年（明治32）12月27日，收錄於前掲拓殖大學百年史編纂室《東洋文化協會五十年史稿》，頁351。

⁴⁹ 前掲拓殖大學百年史編纂室《東洋文化協會五十年史稿》，頁49-50。

治35) 大阪第五屆內國勸業博覽會的開辦，興建「臺灣會館」以方便臺裔人士內地觀光之所需。⁵⁰

台灣支部致力於台灣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相關情報之收集，並透過演講會的舉辦與《會報》之發行，把台灣的歷史、風俗、現況、台灣關係者的組成等各種資訊，正確地傳達給日本社會大眾。⁵¹而時序到了1915年(大正4)以後，協會臺灣支部的事業發展面向，則從臺灣逐步擴展至東亞社會的其他區域，此時協會已從「台灣協會」改組成「東洋協會」，台灣支部的首要業務，除了台灣之外，還包括對華南、南洋在內等東洋社會的區域特質，進行調查、解明。⁵²

第二節 「台灣協會學校」之創立

而「台灣協會」之於日本近代史上的角色扮演，以一言蔽之，即承擔殖民地經營人才之養成。

鑒於日本治台初期可用人才不足，而在台灣社會引發一些不必要的混亂與摩擦。在桂太郎會長的認知中，考慮台灣經營的未來發展方向，勢必會與南清地方之思考連結，因此第一要務莫過於殖民地經營人才之養成。而桂太郎的想法，已為「台灣協會」其後的業務發展，提供了一個清楚的發展方向，畢竟當時在任職之官員因欠缺熟練、誠實、嚴正之輩而引發諸多問題，有目共睹的；⁵³而試圖活躍於台灣社會之滯台日裔商人，則多為欠缺經驗與資本

之徒，充其量不過是所謂的有志者或壯士罷了，不僅商法拙劣，更屢屢錯失商機，基本上這些人是無法進入真正商人的行列。⁵⁴

而殖民地經營人才的養成，與其說是為了將來，不如說是現階段當前之急務。領台初期，台灣總督府所屬官員的不正行為，以及因素行不良而渡航台灣的日裔亡命之徒，皆成為當時日本在台殖民經營困頓的要因。而無論是官吏或商民，滯台日人的一個共通特徵，就是無法有效使用台灣語。而這也是長久以來水野遵幹事長所不斷強調的，語言教育之於台灣經營的必要性，台灣協會的規約第二條第五項有「促進台日民眾彼此語言練習之機會」，換言之，設置「台灣協會學校」修習必要之語言，乃水野遵思考之體現。⁵⁵而套用東京帝國大學文學士河合弘民的理解，協會學校的設置更是為了「台島百年之長計」所考量。⁵⁶

1899年(明治32)4月11日，在「台灣協會」京都支部的成立大會上，水野遵曾發表設置學校，教習台灣語之必要性等相關言論；同年5月28日，召開「台灣協會」第一次總會時，水野遵再次重申自己之於設置殖民經營學校，並修習台灣語的思考。身為幹事長的水野遵，其思考方針自然成為「台灣協會」運作的執行目標，而此亦造就翌年(明治33)5月26日，在「台灣協會」第二次總會席上「台灣協會學校」設立具體案的成形。⁵⁷事實上，鑑於臺灣社會文化的有效提升，早在1899年(明治32)2月，子爵坂谷芳郎便以臺灣經營最大之急務，莫過於設立大學，而向會長桂太郎提出「臺灣大學

⁵⁰ 前揭拓殖大學百年史編纂室《東洋文化協會五十年史稿》，頁50-51。

⁵¹ 前揭河原直人〈東洋協會における南洋への関心について：1910年代を中心に〉，頁4。

⁵² 「改正支部規則」(《臺灣時報》第67號)，1915年(大正4)4月15日，收錄於前揭拓殖大學百年史編纂室《東洋文化協會五十年史稿》，352頁。

⁵³ 前揭山根幸夫〈台灣協會の成立とその発展：日本植民政策の一側面〉，頁59。

⁵⁴ 前揭山根幸夫〈台灣協會の成立とその発展：日本植民政策の一側面〉，頁59。

⁵⁵ 前揭台灣協會誌〈台灣協會設立主意書〉(收錄於《台灣協會會報》第一號)。原文是「彼我言語練習ノ便ヲ図ル事」。

⁵⁶ 河合弘民〈台灣協會學校の設立〉(收錄於《台灣協會會報》第22號)，1900年(明治33)7月20日。

⁵⁷ 前揭山根幸夫〈台灣協會の成立とその発展：日本植民政策の一側面〉，頁61。

設立相關意見書」。⁵⁸顯見「臺灣協會」成員之於臺灣經營的深思熟慮。

而向來主張設置「台灣協會學校」教授日本官民台灣語的水野遵，壯志未酬，在協會學校創立的前夕，1900年（明治33）6月15日，便因病過世。⁵⁹1900年（明治33）5月，在「台灣協會」第二次總會時決議通過成立「台灣協會學校」，並於同年的9月15日舉行開學式。而「台灣協會學校」，在其後的「東洋協會」時期，轉型成今眾所周知的拓殖大學。

台灣協會學校設立宗旨

據「台灣協會學校設立趣意書」之所載，「(略) 台灣之地西控支那大陸，南望南洋諸島，不獨是通商貿易的策源地，其陸所產、其海所藏，若能開乎，則內養三百萬眾，外足充四鄰之需，真可謂是帝國重鎮、南方寶庫，唯其地接熱帶，不獨氣候風土，習俗言語亦異，(略) 苟投此裡，從公私之業，欲全新領土經營之功，開發天惠富源，則非先通其語言，諳其事情不可(略)」，而基於前述理由，因此「設立台灣協會學校，培養經營新領土所需之往邁

敢為之人才，彼我交情能潤和便安，以裨補殖產興業之發展」⁶⁰。由此推知，「台灣協會學校」之辦學目標，主眼於台灣之地利，西控亞洲大陸，南望南洋諸島，因此以台灣「外地」為首，應定期培養可前往東亞其他地區活動之人才，而活動之區間則意圖由台灣延伸至南清地方。

換言之，「台灣協會學校」的成立可謂是「南進論」思考之落實，亦為其後「大正南進」風潮埋下伏筆。初起之際，依「台灣協會學校」規則第一條「本校ハ台湾及南清地方ニ於テ公私ノ業務ニ從事スルニ必要ナル學術ヲ授クルヲ目的トス」之所記，⁶¹則已開宗明義強調，這所學校的設立是為了能在外地方活動，最早設立之專業教育機構。⁶²

「台灣協會學校」修業年限三年，課程內涵中以語學最為重視，包括台灣語、清國官語、英語等語言之修習，便佔了半數以上的時段。其中，又以台灣語的學習最為重要，無論是行政科抑或是實業科，皆為各年級學生的必修課程之一（參照表1）。換言之，將來可能派駐人員在台灣與南清地區活動之念頭，一直存於主事者的腦海裡。

(表1) 1901年版「台灣協會學校規則」附件

第一學年 科目(學分數)	台灣語(7)、北京官話(5)、法學通論(2)、英語(6)、經濟學(2)、亞細亞史(1)、商業地理(1)、簿記(2)、數學(2)
第二學年 科目(學分數)	台灣語(7)、北京官話(5)、英語(5)、簿記(1)、統計學(1)、經濟學(2)、植民論(1)、商法(1)、民法(1)、數學(2)
第三學年 行政科 科目(學分數)	台灣語(4)、北京官話(3)、英語(4)、刑法(1)、商法(2)、民法(2)、植民論(2)、財政學(2)、統計學(1)、行政法(1)、憲法及國際法(2)
第三學年 實業科 科目(學分數)	台灣語(6)、北京官話(4)、英語(6)、簿記(2)、統計學(1)、農政學(1)、商工經濟學(2)、財政學(1)、數學(1)

(作者整理，參照〈臺灣協會學校設立趣意書〉第23條，科目後的數字單位是「小時」)

⁵⁸ 〈台湾大学設立関スル意見〉(《台湾協会會報》第5号，1899年(明治32)2月28日)，收錄於前揭拓殖大學百年史編纂室《東洋文化協會五十年史稿》，頁375-376。

⁵⁹ 前揭山根幸夫〈台湾協会の成立とその発展：日本植民政策の一側面〉，頁76。

⁶⁰ 參照〈台灣協會學校設立趣意書〉(收錄於《台灣協會會報》第二十一號)，1901年6月20日，頁80。

⁶¹ 〈臺灣協會學校設立趣意書〉(《臺灣協會會報》第21號)，1900年(明治33)7月4日，收錄於前揭拓殖大學百年史編纂室《東洋文化協會五十年史稿》，頁379-382。

⁶² 前揭河原林直人〈東洋協会における南洋への関心について：1910年代を中心に〉，頁45。

1900年（明治33）第一批學生百名，是由一百八十多名募集者中篩選而來的。同年9月15日，在日本東京麴町區富士見町的臨時校舍舉行開校典禮。兼任協會學校校長的桂太郎會長在新生訓辭中特別強調，他期待學生諸君畢業之後能活躍於台灣或南清地方，而除了要有堅定之志向、與足夠的專業知識以外，更要有強健體魄。⁶³

值得關注的是，當時不僅是桂太郎會長，其他的台灣關係者亦把協會發展的問題焦點擺放在「台灣及南清地方」。換言之，從時人的眼界觀之，「台灣協會學校」的成立是為了拓展台灣與南清地方之經貿市場，而因應人才培育之需求。因此，該校的成立可謂是時人之於「南進」的具體展現。

由於台灣總督府對協會學校寄與厚望，同年（明治33）12月18日，時任民政長官的後藤新平在東京港區芝的紅葉館接受該協會款待時，亦強調人才養成等問題乃總督府當前之急務，在官立學校設置計劃尚未成形之際，無論公私業務等相關人才之需求，總督府愈益仰賴「台灣協會」的人才養成。「台灣協會學校」的營運更成為該協會重要的推廣業務之一。⁶⁴

即使包括台灣總督府在內，社會各界對「台灣協會學校」抱以深切期待，然而直到1901年（明治34）11月1日，「台灣協會學校」才擁有自己的校舍。「台灣協會」向政府租借了位於東京小石川區茗荷谷町32、33番地的五千坪土地，並由與台灣近代史有深厚淵源的愛

國商社「大倉組」接手動工，而完成校舍之興建。⁶⁵

不容置疑地，設立「台灣協會學校」的構想能順利成形，水野遵在背後扮演重要的推手。過去水野遵以譯官身分而奠下豐富的台灣經驗，他深切瞭解台灣經營的當務之急，莫過於語言教育。因此1898年（明治32）5月18日，「台灣協會」舉行首次總會時，水野遵便提案，強調應設立學校，教授台灣語。換言之，殖民經營學校的設立方針起自於水野遵的提案，⁶⁶而台灣語的教習目的在於台灣現地勤務人員之養成，這亦是何以在殖民學校之「入學誓約書」中，學員必須同意簽署畢業後將永久從事台灣，以及南清地方之勤務的理由。⁶⁷

根據1903年（明治36）「台灣協會學校」第一屆畢業生就職彙報顯示，已就職成員中，多數任職於台灣總督府，並擔任各廳雇員，而其餘成員亦多在跨日、台、清等地之民營機構服務。⁶⁸換言之，當初「台灣協會學校」成立之目的主在，「候補台灣總督府文官實缺，若有不願文官者，即聽隨意，或在台灣，或前往清國南方，買賣貿易，從事實業亦可，故在校學習之學術，是官商均為其用也」等設校宗旨，⁶⁹已被具體落實。

「台灣協會學校」業已成為「台灣協會」協助殖民地經營拓展的重要助成事業之一，並可從該校第一屆畢業生多任職於台灣總督府等事實，以為佐證。⁷⁰根據〈台灣協會學校第一屆畢業生就職彙報〉之所記，以小谷六郎為首

⁶³ 前掲山根幸夫〈台灣協會の成立とその発展：日本植民政策の一側面〉，頁62。

⁶⁴ 前掲山根幸夫〈台灣協會の成立とその発展：日本植民政策の一側面〉，頁63。

⁶⁵ 前掲山根幸夫〈台灣協會の成立とその発展：日本植民政策の一側面〉，頁63。

⁶⁶ 前掲山根幸夫〈台灣協會の成立とその発展：日本植民政策の一側面〉，頁60。

⁶⁷ 前掲山根幸夫〈台灣協會の成立とその発展：日本植民政策の一側面〉，頁62。

⁶⁸ 〈台灣協會學校第一回卒業生就職彙報〉（收錄於《台灣協會彙報》第五十九號），1903年8月20日，頁61-62。

⁶⁹ 〈台灣協會學校〉（收錄於《台灣協會會報》第二十一號），1900年6月20日，頁85-86。

⁷⁰ 參照〈台灣協會學校第一回卒業生就職彙報〉（收錄於《台灣協會會報》第五十九號），1903年8月20日，頁61-62；前掲河原林直人〈東洋協会における南洋への関心について：1910年代を中心に〉，頁4-5。小谷六郎、鹿山壽作、宗島慶三、保田宗次郎、田中政吉、坪田次郎、高木保太郎、千葉真、深堀昌義、牧田清吉、森永信光、岸本藤太郎、安井重吉、江上壽吉、井浦收吉、矢野恆一、山西隆吉、伊原開次郎、久保田重文、齋藤志、河野豊一等21名成為臺灣總督府旗下各廳雇員。

等21名學生在畢業後成為臺灣總督府各廳雇員；本多兵一、狩野豐松、中川四郎（天津支店）等3名進入大倉組服務；伊藤周松則任職於大阪商船會社。

1903年（明治36）3月27日，依照勅令「專門學校令」之公告，「台灣協會學校」被認可為專門學校。因此，翌1904年（明治37）4月，「台灣協會學校」改名為「台灣協會專門學校」。⁷¹同年2月，日俄戰爭爆發，但因戰場位於清土，日本陸軍省極需能通曉清國語（北京官話）人才，「台灣協會專門學校」所培訓之校友，隨即找到用武之處。

自此以後，該校的辦學目標乃與「戰爭協力」結下不解之緣。⁷²「台灣協會專門學校」的校友與學生中，有不少人以通譯官身分，隨軍出征，包括第一屆畢業生天野定吉、矢野幸一、宮澤盛三郎、遠藤三藏、牧野駒三，以及當時在校的三年生的大野正家、加藤□、梨羽時介、蒲原虎三、都留範治等，分別被配屬在第二師團司令部、第一師團、第一軍兵站監部、近衛師團司令部等軍團麾下。⁷³

配合戰事之需求，1904年（明治37）4月，「台灣協會專門學校」乃修訂學則，在現行之二十七條以外，又追加了第二十八條「在學中戰時に於て陸海軍兵役以外の軍務に従事する者は其間休學することを得」，即在學期間，從事陸海軍兵役以外等軍務活動者，則得以辦理休學。⁷⁴

第三節 「台灣協會」的轉型：日俄戰爭與「東洋協會」

伴隨日俄戰爭的獲勝，日本如願以償地取得遼東半島租借權，並成為韓國的保護國，日本殖民地經營的範圍一舉擴張至亞洲大陸。「台灣協會」的活動區間亦開始從台灣跨越至海峽對岸，協會的名稱及其實質內容乃逐漸變得名實不符。

有鑑於此，1906年（明治39）12月，在會長桂太郎領導下，決定重新調整「台灣協會」的名稱與內涵。⁷⁵翌1907年（明治40）2月，協會名稱改為「東洋協會」；而原機關誌《台灣協會會報》則改稱為《東洋時報》；至於原「台灣協會專門學校」，則改名為「東洋協會專門學校」。⁷⁶1909年（明治42）創刊之《台灣時報》，乃成為「東洋協會」台灣支部之機關誌。⁷⁷

何以把「台灣協會」改名為「東洋協會」？「東洋」又是什麼？簡言之，所謂「東洋」（the Orient）是相對於西洋的一個概念，其主要區塊涵括了中東地區、中亞細亞，以及東亞地區等亞洲全境。⁷⁸

日俄戰爭後，日本帝國的海外進出一改過去的「南進」思考，開始朝往亞洲大陸的方向拓展。值此之際，「台灣協會」的事業內容因應時代之氛圍與需求而有變更，協會組織亦隨之改組。換言之，協會本身不能僅自限於台灣經營人才之培育，必須更進一步，把殖民地經營人才送往朝鮮半島、遼東半島等地發展。⁷⁹

⁷¹ 前掲山根幸夫〈台灣協會の成立とその発展：日本植民政策の一側面〉，頁64。

⁷² 前掲山根幸夫〈台灣協會の成立とその発展：日本植民政策の一側面〉，頁65。

⁷³ 〈同校卒業生及在學生の譯官任命〉（收錄於《台灣協會會報》第六十七號），1904年4月20日，頁41。

⁷⁴ 〈台灣協會專門學校學則改正〉（收錄於《台灣協會會報》第六十七號），1904年4月20日，頁41。

⁷⁵ 「（略）今や帝国の東洋に於ける地位及び形勢も一変し時勢の推移は本協會の事業を積極的に発展せしむるの必要を見るに至りぬ（略）」（收錄於『台灣日日新報』「台灣協會臨時總會（目的の擴張改名東洋協會）」，1907年1月9日）。

⁷⁶ 前掲山根幸夫〈台灣協會の成立とその発展：日本植民政策の一側面〉，頁66。

⁷⁷ 前掲山根幸夫〈台灣協會の成立とその発展：日本植民政策の一側面〉，頁74。

⁷⁸ 參照星斌夫撰「東洋」之詞條（網路線上《日本大百科全書》，小學館），網址：<http://100.yahoo.co.jp/detail/%E6%9D%B1%E6%B4%8B/>（2013/01/01），2013.2.14。

⁷⁹ 前掲河原林直人〈東洋協会における南洋への関心について：1910年代を中心に〉，頁5。

1907年（明治40），即「東洋協會」改名的同年6月，在京城設置韓國支部、在旅順另設滿州支部；接著，同年10月，更在京城設立「東洋協會專門學校」京城分校。原有的實業家團體「滿韓起業同志會」則主動解散，旗下的300名會員則集體加入了「東洋協會」。⁸⁰

而「台灣協會」在日俄戰後轉型為「東洋協會」，過去該協會是體現日本社會南方意識之一文化團體，套用時人竹越與三郎的說詞，⁸¹今後的日本將從「日本人的日本」或「東洋的日本」，朝往「世界的日本」豹變，然而竹越的南方思考實際上是跨越了南洋之範疇，而朝往中南美洲方向發展。⁸²

種種跡象顯示，「東洋協會」改名後不久，該協會便成為那些走大陸進出路線者的一個期盼。而何以如此呢？援引近代日本政治家原敬之說法，⁸³問題的關鍵在於移民事務是難以與通商事務切割處理。⁸⁴

明治時期的自由主義經濟論者如田口卯吉、竹越與三郎等人主張，國家之於資源、殷富的取得，應基於貿易或移民的手段。⁸⁵換言之，「東洋協會」之事業發展，基本上與日本的大陸經營難以割捨，⁸⁶但此一時期「南進」

的概念幾乎是不見於南洋地區，而僅一味地朝往南清地區發展。⁸⁷

在〈「東洋協會」規約〉第一條明定「東洋協會」存立之目的如下：

本会は東洋に於ける平和文明の事業を裨補するを以て目的とし台湾、韓国及滿州に於ける諸般の事項を講究シ以て彼我の事情を疏通し相互の福利を増進するを務むるものとす

即，「東洋協會」存在之目的是為了東洋地區的和平與文明，謀求共同福祉。⁸⁸即便「東洋協會」的事業範圍因應時局變化，而朝往台灣以外之地區擴展，但原「台灣協會」事業重點之一的「人才育成」，不僅沒有因此改變，甚至變得更是重要。⁸⁹而「台灣協會」成立初始之際，便力主協會必須辦理學校，培育殖民地經營人材的水野遵，其高瞻遠見，令人矚目。

根據名古屋大學經濟學部副教授河原林直人之研究指出，1907年（明治40）從協會學校第四期畢業生有62名，其中14名任職於韓國政府財政部門，而赴台履薪者有12名，即約五分之一的學生在台灣總督府就職。隨後，任職於亞洲大陸者人數日漸超過任職於台灣者，1913

⁸⁰ 前揭河原林直人〈東洋協會における南洋への関心について：1910年代を中心に〉，頁5-6。

⁸¹ 竹越與三郎（1865.10.14 - 1959.1.12），日本新潟縣人，明治期至昭和期日本の政治家。慶應義塾大學中退後，曾擔任《大阪公論》、《時事新報》、《國民新聞》記者，並於1929年創立雜誌《世界之新聞》，擔任主筆。在政壇上屬於立憲政友會，擔任過五屆眾議院議員及貴族院議員（參考《台灣歷史辭典》網路版，網址如下：<http://nrch.cca.gov.tw/ccahome/website/site20/contents/006/cca220003-li-wpkbhisdict000927-0308-u.xml>）。

⁸² 上野隆生〈近代日本外交史における「北進」と「南進」〉（《和光大学現代人間学部紀要》第1号）2008年3月，頁112。

⁸³ 原敬（1856-1921），近代日本政治家。盛岡人，歷經新聞記者、外交官等職業，最後擔任大阪每日新聞社社長。加入立憲政友會後，曾擔任通相、內相，還曾任政友會總裁。1918年（大正7）繼寺內內閣之後，組成近代日本史上最初的政黨內閣，人稱「平民宰相」，但因強硬政策引發不滿勢力的反動，最後在東京車站被暗殺身亡（參考三省堂《大辭林》網路版，網址：<http://www.weblio.jp/content/%E5%8E%9F%E6%95%AC>）。

⁸⁴ 前揭上野隆生〈近代日本外交史における「北進」と「南進」〉，頁112。

⁸⁵ 前揭上野隆生〈近代日本外交史における「北進」と「南進」〉，頁113。

⁸⁶ 前揭河原林直人〈東洋協會における南洋への関心について：1910年代を中心に〉，頁6。

⁸⁷ 前揭河原林直人〈東洋協會における南洋への関心について：1910年代を中心に〉，頁7。

⁸⁸ 參照〈東洋協會趣意書並びに規約〉（收錄於《台灣協會會報》第百號，1907年1月20日），頁2。

⁸⁹ 參照〈東洋協會の沿革目的及事業〉內容中有「II 東洋各地に於ける公私の業務に従事すべき人材養成のため左記學校の設立」之相關內容（收錄於大正3年6月1日～12月1日「東洋協會設立ノ件」，日本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所藏）。

表 (2) 1907年度 (第一~第四回生) 協會專門學校畢業生218名當中赴臺履薪者職屬與人數

台灣總督府	30名	久米商會 (臺北)	2名
臺灣安平海關	1名	小栗商店	1名
台灣銀行	2名	三井物產	1名
大倉組	1名	日本郵船會社	2名
三井物產	2名	臺東公學校	1名

(作者整理, 參照拓殖大學百年史編纂委員會《拓殖大學百年史: 明治篇》, 頁207-213)

年度 (大正2) 之後不再有畢業生任職於台灣總督府了。⁹⁰

世界史上非白人國家而擁有海外殖民地, 且以一個半殖民地國家試圖管理殖民地, 台灣社會之於日本的殖民統治, 可謂是人類歷史上之首例。草創之際的明治日本, 百廢待興, 經營台灣所帶來額外的財政負擔與人員生命之付出, 迫使台灣總督府與明治政府必須共同面對來自國內社會之批判眼光, 以及海外世界的冷眼態度。日清甲午戰中所獲取的「戰利品」台灣, 日本政府應如何對處之? 而又應如何啟蒙日本的本土社會, 俾使國民大眾理解台灣之於日本帝國的重要性, 在在攸關明治日本之於國際社會的地位能否有效提升。依水野遵之見, 這將影響著明治日本的國家形象, 只許成功, 由不得失敗, 而這亦成為「台灣協會」所背負的時代使命。⁹¹而「台灣協會」初起之際便力主協會必須辦理殖民經營學校, 培育殖民地經營人才的水野遵, 其高瞻遠見, 亦為其後日本的海外擴張預做了準備。

第二章、南進論與「東洋協會」

南進論：台灣經營策的思考原點

所謂「南進論」, 在日本外交辭典的定義中, 所謂「南進論」, 基本上是從外交思考之

觀點, 把南洋置於日本國益圈的範圍內, 以使得日本之於南洋的進出被合理化。⁹²而這個概念在1935年 (昭和10) 之後, 成為日本外交思考的主流。自自治政府成立以來, 「北進論」與「南進論」之間, 即不斷處於相互消長的角力關係中。

1874年 (明治7) 的「台灣出兵」, 台灣史上稱之為「牡丹社事件」, 這是日本自幕末開國以來, 具體落實「南進論」思考的一個開始。「台灣出兵」最大的獲利, 不外乎是得以名正言順地把琉球群島納入日本版圖範圍內, 並有效完成「琉球處分」之作業。從國家防衛線角度觀之, 即使當時日本國內社會目光的焦點多放在「北進論」問題, 但在具體行動上, 顯然「南進論」比「北進論」早一步被落實。⁹³

接著, 因「北進論」思考所引發的日清甲午戰爭, 最後雙方簽署馬關條約, 日本獲取史上第一個海外殖民地台灣, 進而在朝往「南進論」之終極目標南洋拓殖的歷程中, 找到一個跳板。相對地, 與「北進論」思考相結的遼東半島割讓, 卻因俄、德、法之「三國干涉」, 迫使日本政府無法如願以償。

然而, 獲取殖民地台灣之後, 「南進論」思考卻開始有著西進趨勢, 即逐漸朝往南清方向發展。誠如時人入江寅次所感嘆的, 明治中期以後, 日本社會的南方關心明顯衰退, 「南

⁹⁰ 前掲河原林直人〈東洋協會における南洋への関心について：1910年代を中心に〉, 頁6。

⁹¹ 拙著《水野遵～一個台灣未來的擊畫者》(台灣書房, 2011), 台北, 頁132。

⁹² 上野隆生〈近代日本外交史における「北進」と「南進」〉, 頁110。

⁹³ 前掲上野隆生〈近代日本外交史における「北進」と「南進」〉, 頁110。

進論」思考甚至一度消聲匿跡。⁹⁴特別是在歷經日俄戰爭慘勝，日本社會「國權論」思想高漲階段，在國家防衛線的拓展上，重新帶動對「北進論」思考的關注，日本政府的南方志向則必須等到1940年以後。就在跌跌撞撞、試行錯誤的過程中，近代日本的對外關係與國策設計，造就出水野遵與台灣社會的不解之緣。

不容置疑地，在民間經濟的需求下，近代日本社會一直存有強烈的南方意識。首波的南進風潮出現在1880年代，在民間自主的移民事業與南洋探險等潮流下，日本社會上下充斥著各種南洋相關之情報與訊息。而這股對南方發展的期待，則具體展現在《東京經濟雜誌》創辦人田口卯吉身上。1890年（明治23），田口從「土族授產」⁹⁵的角度思考日本在南洋諸島開發殖民地之必要性，甚至進而成立「南島商會」，充分展現出明治時期部分有識者對南洋與移植民事業的關注態度。⁹⁶同時，這股南方熱的風潮與移民事業之興盛，亦促使外務省一度還為此特別增設了移民課。⁹⁷然而，一如前述，明治初期日本社會之於「南進」的射程，仍不出南清之範疇，而臺灣則扮演南方防衛線的強固基地。⁹⁸

「東洋協會」的規模與資金

一如前述，1907年（明治40）「台灣協會」改組為「東洋協會」，「東洋協會」承繼「台灣協會」之舊部而擁有五個分會，包括台北、大阪、神戶、京都、名古屋等，以及數以千計之會員。該會最高峰的時期是後藤新平擔任會長時代之1923年，當時有會員3004名；後藤新平

⁹⁴ 前掲上野隆生〈近代日本外交史における「北進」と「南進」〉，頁111。

⁹⁵ 1868年維新之後，明治政府為了把傳統封建家臣團解體，以農耕地授與的方式，試圖解決舊士族的經濟困境。

⁹⁶ 前掲上野隆生〈近代日本外交史における「北進」と「南進」〉，頁111-112。

⁹⁷ 前掲上野隆生〈近代日本外交史における「北進」と「南進」〉，頁112。

⁹⁸ 前掲《拓殖大學百年史・明治編》，頁43。

⁹⁹ Hyung Gu Lynn, "Politics and Knowledge: The Toyo Kyokai's Informational and Political Projects", *Tokushoku University History Review*, 1/2 32a-1a, 1999-03-31, P.5-6.(收錄於拓殖大學百年史編纂委員會《拓殖大學百年史研究》1/2號合併版, 1999年3月)。

會長過世後，會員人數則大幅下滑。然而，從1929年的1727名會員，乃至1944年的1840名，會員人數每年平均維持在1800~1900名左右。不容諱言地，「東洋協會」的財務結構一如過去，大多得自於財閥、政界人士與政府官僚之捐獻，少部分則是取自於會費收入。「東洋協會」繼過去「台灣協會」之發展脈絡，亦透過人際網絡有效獲取資金與人力資源。

1913年（大正2）桂太郎會長卸任之後，在小松原英太郎會長時期，協會之財務狀況明顯呈現衰退，而受到1918年歐戰以後景氣蕭條所影響，亦連帶拖累月刊《東洋》之營運。這個現象直至1920年代後藤新平會長時期與1930年代水野鍊太郎會長時期，才明顯轉圜。

1914年，該協會從原本的社團法人轉型成財團法人，目的亦是著眼於財務結構之強化。如此一來，協會則可在機關誌中刊登廣告，亦可投資股票，或向台灣總督府、朝鮮總督府、南滿州鐵道株式會社、樺太廳等承接辦理各類計畫案。因此，其後的「東洋協會」不僅擁有股票、不動產，更在幾家銀行開立長期存款戶頭。⁹⁹

第一節 文化團體「東洋協會」的特質

「台灣協會」的思想傳承

1898年（明治31）7月「台灣協會」成立，該協會從原本僅扮演台灣殖民事業之奧援角色，逐漸轉型成會長桂太郎個人的政治基盤。而伴隨歲月的推移，「台灣協會」更改組成「東洋協會」，透過亞洲相關之市場與資源等經濟

情報的提供，逐步發展成一政界派閥，甚至意圖左右政府的外交方針。在近代日本的各種別具區域特質之社團組織中，「東洋協會」則因桂太郎與其後的後藤新平等二人曾擔任過協會會長，而較同時期其他的文化團體更具影響力。

一如前述，「東洋協會」是繼「台灣會」、「台灣協會」所衍生出之一社團組織。「台灣協會」成立的初始之際，乍看下似乎是為桂太郎的政治生涯量身打造的，但其幕後真正的推手則是台灣總督府初代民政長官水野遵。鑑於1896年桂太郎曾擔任台灣總督（6.2-10.14），水野遵乃推舉桂太郎出任會長，自己則任總幹事一職。桂太郎之所以有機會出任會長職務，除了他有殖民經營的因緣，以及有其臺灣統治的經綸之外，更重要的是他有從事社會事業的理想與抱負。早在1879年桂太郎還僅是陸軍中佐時期，便致力於「地學協會」的設立，又與不少同好合作將「獨逸學會」擴編成「獨逸學協會」；其後，1911年奉天皇勅語而創設具經世濟民特質的「濟生會」，對「日本赤十字社」與「癌研究會」的設立亦有其貢獻。¹⁰⁰換言之，桂太郎肩負「臺灣協會」會長頭銜，應該是當之無愧。

「台灣協會」憑藉桂太郎與水野遵之名號，而招募不少政商名流入會，其中有不少是台灣經驗者，抑或是水野遵在舊尾張藩之同鄉。「台灣協會」的事業內容，主要是協助強化台灣的殖民事業，包括增進台灣社會的經濟利益與提供相關情報資訊。

1900年（明治33），水野遵於少壯之年去世，「台灣協會」的運作則落入桂太郎的全權

掌控下，其後的「東洋協會」之營運，則是在桂太郎會長領導下，以資訊提供與政治活動而逐漸成型。或許是受到水野遵思考所影響，桂太郎之於對外關係的思考基本上亦被歸屬於南進策之範疇。1896年（明治29）桂太郎曾以他的台灣經驗發表〈台灣統治に関する意見書〉，把自己之於台灣統治的相關意見提供給日本政府參考，¹⁰¹他從台灣的地勢、地利，看到當時仍深陷不平等條約桎梏的日本，未來將透過台灣而走向國勢伸張的可能性，進而主張日本的對外方針應走「北守南進」策。畢竟台灣之於東亞的地理位置不僅對處南清，且遠制南洋，因此桂太郎的〈台灣統治に関する意見書〉開宗明義強調，台灣的施設經營不應僅侷限於島內，更要確立清楚的對外進取策。¹⁰²桂太郎之於台灣經營的思考，日後亦有效落實於「東洋協會」的會務發展上。

長久以來，日本的殖民事業並沒有投注資金於殖民地官僚之訓練，殖民地官僚人才之來源，多數是出自於內務省官員，抑或是一些具警務背景者，而前者多被安置於高階職務上，但二者之間共同特徵是多為一些欠缺殖民事務訓練者。¹⁰³

「東洋協會」旗下之拓殖大學，其實是源自於1900年所創之「台灣協會學校」，該校的成立宗旨在於培訓能在地或東亞地區任職之人員為目標。事實上，這項思考的源起來自於水野遵，而水野的思考源流則是仿效英國之於印度的殖民統治。¹⁰⁴

而援引此類殖民經營學校畢業生之出路為例，1903年「台灣協會專門學校」時期的第一批學生，45名畢業生中有21名進入台灣總督府

¹⁰⁰ 拓殖大學百年史編纂委員會《拓殖大學百年史・明治編》（拓殖大學，2010年），東京，頁46。

¹⁰¹ 桂太郎〈台灣統治に関する意見書〉（現藏於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1896年），東京。

¹⁰² 同注83，桂太郎〈台灣統治に関する意見書〉，頁1-2。

¹⁰³ Hyung Gu Lynn, "Politics and Knowledge: The Toyo Kyokai's Informational and Political Projects", p13.

¹⁰⁴ 前揭Hyung Gu Lynn, "Politics and Knowledge: The Toyo Kyokai's Informational and Political Projects", p13.

就職。¹⁰⁵然而，伴隨1905年日俄戰爭之獲勝，第三屆畢業生之就業空間，則逐步擴大至滿州、朝鮮等地。

「東洋協會」與日本政界的互動（1907-1919）

即使「東洋協會」內部承襲自「台灣協會」，而有「不涉及政治」之不成文規定，但事實上卻不竟然真是如此。¹⁰⁶

1907年(明治40)「台灣協會」於改組成「東洋協會」之後，協會所關心之範疇亦從台灣逐步擴大至朝鮮、滿洲、清國，更在政商界廣招新血入會，甚至成立「東洋拓殖株式會社」，一般簡稱「東拓(ODC)」，在部分韓國政界人士的支持與日本大藏省的財務奧援下，有效整合各種人際網絡與情報資訊。

然而，鑑於「東拓(ODC)」案並不見容於韓國社會，時任韓國統監的伊藤博文則堅持應在韓、日兩國之共同法律上另組新公司。而「東洋協會」在京城與大連之支會，以及副會長小松原英太郎的視察之旅等，皆曾為「東拓(ODC)」成立計劃，提供針貲。而經過幾番辯論後，1908年(明治41)8月乃決定另組一日韓委員會，由116名會員投票通過，才正式同意「東拓(ODC)」成立案。

不容諱言地，「東拓(ODC)」案的成立，會長桂太郎個人的魅力與人脈關係是有效排除各項法律障礙之關鍵；而時任大藏大臣的阪谷芳郎亦是促使「東拓(ODC)」有效通過日本大藏省的公司成立審查之另一個關鍵，阪谷個人亦是「東洋協會」會員。然而，雖然「東拓(ODC)」成立，「東洋協會」坐擁董事席次，但協會在公司運作上的影響力，卻是微乎其微。¹⁰⁷

正當許多政黨或社團都把時政議題聚焦在

國內問題上時，「東洋協會」則試圖凸顯社團的共同利益應放在對外方針上。因此，協會會員應在各種對外方針議題上建立共識，並於例行的演講活動中邀請相關之政治人物介紹海外情勢，並增進與其他社團之間最小程度之互動。而會長桂太郎則利用「東洋協會」建立其人脈關係，並從政府元老山縣有朋派系中逐漸地獨立出來。

桂太郎的所屬政黨「立憲同志會」在招募新血時，即使也有其他社團成員加入其中，但他之於「東洋協會」的人脈關係卻展現出一定的影響力。例如，其後亦擔任協會會長之後藤新平，他是屬桂太郎派系，並經「東洋協會」而加入「立憲同志會」，即使他曾公然表達反對該黨兩名重要黨員，加藤高明與大浦兼武。桂太郎與後藤新平在對外方針上，特別是之於滿洲擴張等議題，擁有近乎相同之立場，即透過南滿鐵道而與俄羅斯合作。

桂太郎亦曾策動田健治郎加入其所屬政黨「立憲同志會」，以共同思考對外方針之相關議題，但卻因故失敗。即使如此，「東洋協會」則可繼續保守其超黨派色彩，並獲取各方資訊。類似的案例亦曾發生在繼任的小松原英二郎會長身上，即使小松原並沒有加入桂太郎之「立憲同志會」，但仍可透過「東洋協會」而有相互連繫之管道。「東洋協會」的超黨派特質，在1919年以後後藤新平擔任會長期間，益顯重要。

1913年(大正2)10月桂太郎過世，小松原英太郎則獲選為「東洋協會」繼任會長，在此同時，後藤新平也脫離了「立憲同志會」。小松原英太郎則透過「東洋協會」的資源，計畫進行另一趟中國視察之旅，並與「東亞同文會」聯繫，再以其個人觀點，聯合田健治郎等

¹⁰⁵〈台灣協會學校第一屆畢業生就職彙報〉(收錄於《台灣協會會報》第五十九號)1903年8月20日，頁61-62。

¹⁰⁶「(略)本会には一種不文の憲法の如きもの存し『政治運動に關涉せざることを原則とす、即ち政治の言論並に運動の外に立って(略)』(小松原英太郎〈祝辭〉，收錄於《台灣時報》1909年1月號)，1909年1月。

¹⁰⁷前揭Hyung Gu Lynn, "Politics and Knowledge: The Toyo Kyokai's Informational and Political Projects", pp.8-9.

協同攻擊大隈（重信）首相及其旗下加藤（高明）外務大臣的中國政策，即使後藤新平個人亦不喜加藤，但並沒有加入批判行列。¹⁰⁸

後藤新平則以另一獨立的研究團隊，邀請田健治郎參與其中。事實上，後藤新平的思考比較傾向寺內正毅或原敬之想法，因而當後藤在寺內內閣中任職內務大臣（1916-1918）時，田健治郎即被任命為遞信大臣。後藤新平曾有效化解原敬與水野鍊太郎之間的情結，透過其心腹奧田義人與中村是公之斡旋，即使原敬內閣中沒有「政友會」成員，水野亦欣然接受內政大臣副座之職，而水野鍊太郎則是繼後藤新平之後的「東洋協會」會長。¹⁰⁹

「東洋協會」的相關活動與出版事業

「東洋協會」的影響力不是僅侷限於一個政治性之結集，抑或是僅提供一些相關資訊情報給當時的社會菁英而已，最重要的在於透過協會組織，而源源不絕地提供亞洲市場的資訊與情報給日本社會，同時亦藉此強化日本政界對亞洲議題的關心。

「東洋協會」的機關誌定期提供各種海外政經脈動與社會情勢等相關資訊。這份月刊雜誌源自於《台灣協會會報》（1898-1907, Vols. 1-10），其後則改名為《東洋時報》（1907-1921, Vols. 11-24），接著又改稱為《東洋》（1921-1944, Vols. 24-47）。

《東洋》雜誌所探討之議題，涵蓋台灣、朝鮮、蘇聯、中國，偶而也提及巴西與中亞細亞，亦刊載一些小說羅列其中。文章的內容多以經濟議題為主，但偶爾也插入一些藝術史、

旅遊紀行、政論、牲畜之於人類歷史的角色扮演等。而每月的社論則由日本的政府官員，抑或是在台灣、滿洲、朝鮮的學者執筆撰寫。

「東洋協會」另有〈東洋週報〉與學術雜誌《東洋學報》出刊，更有超過50本的研究小冊出版。而《東洋學報》的內容多取自於白鳥庫吉的「東洋學術調查部」中東亞研究之相關成果。

「東洋協會」亦藉由研討會、展覽或旅遊考察等活動，介紹不同的族群文化與各種近代性概念。透過博物館、畫廊與展覽等展演場域，有效保存他者之文化藝品，進而提升日本社會之於文化知識的層次。同時，「東洋協會」亦資助一些非政府單位的活動，俾使亞洲社會的相關訊息能普遍流通於日本社會。

「東洋協會」以一介非利益團體，憑藉出版品的發行與舉辦公眾資訊活動，而能維持四十年以上，該協會之經營主要是立基於旗下會員多為政府官僚、工商領袖與學術界人士，而會長的個人形象與魅力，更是吸收新會員加入與資金投注的關鍵。¹¹⁰

但不容諱言地，近代日本有部分的政務官僚是透過文化團體之參與，而獲得職務昇遷的機會。以內田嘉吉為例，內田因加入「東洋協會」與「南洋協會」而得以與後藤新平、田健治郎等人接觸，亦才有機會擔任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甚至成為總督。¹¹¹

「東洋協會」的人才培育：「拓殖大學」與「臺灣商工學校」

過去提拔桂太郎與後藤新平的兒玉源太郎，曾

¹⁰⁸ 前揭Hyung Gu Lynn, "Politics and Knowledge: The Toyo Kyokai's Informational and Political Projects", pp.9-10.

¹⁰⁹ 前揭Hyung Gu Lynn, "Politics and Knowledge: The Toyo Kyokai's Informational and Political Projects", p.10.

¹¹⁰ 前揭Hyung Gu Lynn, "Politics and Knowledge: "The Toyo Kyokai's Informational and Political Projects", pp.11-12.

¹¹¹ 前揭Hyung Gu Lynn, " Politics and Knowledge: The Toyo Kyokai's Informational and Political Projects", p.20.

強烈主張應把台灣建設成通往南清、南洋之門戶。桂太郎明白應培訓能在台灣或亞洲工作之人才，以促進殖民機構的有效運作與南方貿易之發展，更重要的是需要一批概念清楚的人員，有效擊劃未來的政策方針。

1908年（明治41），桂太郎在一場演講中強調，「東洋協會學校」與該校在朝鮮的京城分校，其存立之目的在於培訓統監府與京城銀行之人才。桂太郎致力遊說台灣總督應捐款給「東洋協會專門學校」；同時，他亦向朝鮮統監募款，協助京城分校之辦學。¹¹²

1917年（大正6）4月，繼任的「東洋協會」會長小松原英太郎在「東洋協會殖民專門學校」入學典禮致詞中亦強調，該校成立之目的是培育殖民地經營的種子人材，而他也把台灣與朝鮮、滿州、西伯利亞等議題一併思考，鼓勵學生在學好北京語之餘，亦應學好台灣語與朝鮮語。¹¹³

「東洋協會專門學校」除了培養人才提供外地或東亞其他地區之所用外，同時亦提供亞洲地區非政府部門所需之資訊情報。「東洋協會」利用人脈網絡，透過教育事業計畫，邀請包括政府官員、政商界等社會名流前往該校演講，以利各種跨機構討論與情報資訊交換之進行。

該校的課程內容，除了教授台灣語、朝鮮語、北京語、英語、俄語、荷蘭語、馬來語等語言之外，也教授國際法、憲法、商業法、經濟、統計、商業、殖民方針、古語、寫作、亞洲史、數學等各學科。該校成立之後，前面的三十年期間，聘任不少知名教授前往授課。其

中，台灣語的任課教師謝介石，其後則成為滿洲國外交部長，他亦可謂是日治時期台裔人士中的最高職官者。¹¹⁴

(1) 從「東洋協會學校」到「拓殖大學」

1919年（大正8）4月，後藤新平繼桂太郎與小松原英太郎之後，成為第三任校長。1922年（大正11），該校則獲得文部省認可，把原「東洋協會專門學校」轉型成「拓殖大學」。換言之，從最初始的「台灣協會學校」幾度改組後，在後藤新平會長長期轉型成「拓殖大學」。不容置疑地，後藤新平之於拓殖大學的成立，扮演著關鍵性角色。¹¹⁵

「拓殖大學」的成立宗旨，承襲過去「台灣協會學校」以培訓能在地或東亞其他區域任職之人才為目的，而這些人員將來可能成為政府對外方針之實際執行者，或承接「東洋協會」、「東亞同文會」所委託之各類計畫案的執行。

為了協助該校訓練能在亞洲其他區域服務的人才，「東洋協會」竭盡其能地透過人脈網絡，提供人力資源，以有效支援非「帝大」系統的菁英階層；在此背後，「東洋協會」則意圖透過產、官、學界的連結，建構出一跨社團性的大聯盟。換言之，「拓殖大學」的角色扮演乃成為實用知識的傳播者，而「東洋協會」則成為該校名義上的管理者。

而伴隨時代的演進，進入台灣總督府或朝鮮總督府任職者較過去，有日漸下滑之趨勢。依加拿大UBC亞洲研究所學者Hyung Gu Lynn之所見，這種現象出自於殖民統治當局

¹¹² 前揭Hyung Gu Lynn, "Politics and Knowledge: The Toyo Kyokai's Informational and Political Projects", p.14.

¹¹³ 前揭Hyung Gu Lynn, "Politics and Knowledge: The Toyo Kyokai's Informational and Political Projects", p.14.

¹¹⁴ 前揭Hyung Gu Lynn, "Politics and Knowledge: The Toyo Kyokai's Informational and Political Projects", p.15.

¹¹⁵ 前揭Hyung Gu Lynn, "Politics and Knowledge: The Toyo Kyokai's Informational and Political Projects", p.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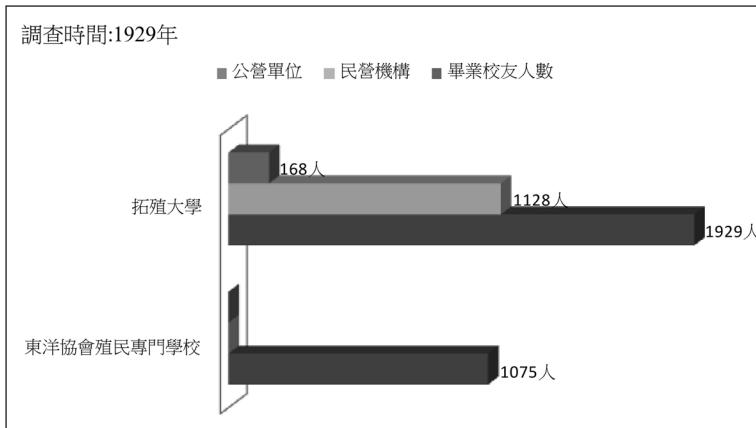
在人才取得的作業上做了些許調整。事實上，有不少的總督府官僚是來自於中央政府各部門，其中尤以內務省為最。不少政府內部的中上層官僚透過曾被派往殖民地任職之經驗，而獲取職務升遷的機會；至於基層的部分，更藉由職務的展期而繼續留任。

然而，1943年（昭和18）9月之後，伴隨南方戰局之緊繃，該校又增設法屬印度支那學院，授以越南與法國等相關知識，並準備遣送50名學生前往中南半島工作，「拓殖大學」之於日本在亞洲的發展，則亦顯重要。¹¹⁶

一如前述，台裔人士謝介石與東洋協會的淵源，起自於台灣協會學校時代。1932年（昭和7）10月18日，東洋協會資深會員謝介石以滿州國外交總長之姿赴日交流。在東洋協會、拓殖大學，以及相關之校友會等三團體聯合主辦下，於帝國飯店舉辦歡迎參會，謝介石在致謝詞中明白指出，拓殖大學的辦學使命，主眼於東洋的發展與產業開拓之人才培訓。而人才的養成與培訓則是「東洋協會」致力於東洋問題研究的另一項重要課題。¹¹⁷

(2)「東洋協會」之於臺灣的人材育成：臺灣

(表3)「東洋協會殖民專門學校」與「拓殖大學」畢業校友的區域分佈與職場屬性



區域分佈

年代	校名	畢業校友總數	畢業校友分佈地區（人數）
1919年	東洋協會殖民專門學校	1075人	台灣（85人）、朝鮮（336人）、滿州（146人）、華中（75人）、華南（8人）、西伯利亞（8人）、南洋（17人）、日本本土（353人）
1929年	拓殖大學	1929人	台灣（75人）、朝鮮（288人）、滿州（197人）、中國（89人）、南洋（17人）、日本本土（908人）、其他（27人）

職場屬性

民營機構（1128人）	朝鮮金融機構（140人）、殖民拓殖公司（84人）、其他
公營單位（168人）	台灣總督府（34人）、朝鮮總督府（36人）、滿州鐵道株式會社（18人）、關東州（11人）、內務省（17人）、外務省（11人）、其他

（作者整理，參照 Hyung Gu Lynn, "Politics and Knowledge: The Toyo Kyokai's Informational and Political Projects" *Tokushoku University History Review*, 1/2 32a-1a, 1999-03-31, p.14）

¹¹⁶ 前揭Hyung Gu Lynn, "Politics and Knowledge: The Toyo Kyokai's Informational and Political Projects", p.16.

¹¹⁷ 〈謝介石閣下歡迎午餐會〉（《東洋》第35年第12號，1932年12月1日），收錄於前揭拓殖大學創立百年史編纂室編《東洋文化協會五十年史稿》，頁434-440。

商工學校

除了日本本土之外，「東洋協會」亦在東亞其他地區廣設學校，提供近代工商業知識的輸出，以及宣導資本主義制度的價值。配合日俄戰後的「北進」思考，「東洋協會」則相繼在滿州創設「大連商業學校（1910）」、「旅順語言學校（1910）」。

其後亦在「台灣商工學校（1917）」、「京城學校（1918）」、「京城高等商業學校（1920）」、「新疆語言研究中心（1932）」等教授一些當地社會之相關語言與專業知識，透過民間興學等模式，俾使在地青年獲取另一個不同的進學管道，亦間接促使三分之二的日裔學生在海外獲取就業的保障。從畢業校友的區域分布與職務的多元性，清楚反映了「東洋協會」的辦學目標。

然而，從「台灣商工學校」走財團法人化路線而不隸屬於「東洋協會殖民專門學校」之分校，則明顯反映出此一時期在「北進南守」國策下，「東洋協會」之於台灣的問題，則相對消極。¹¹⁸

以「台灣商工學校」為例，該校可謂是由「東洋協會」台灣支部與台灣總督府相互連動下所創立的私立實業學校，該校亦即戰後的「開南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初起之際，借用「成淵學校」校舍，以培養台灣在住者子弟成為拓殖人才為目標。¹¹⁹

台灣商工學校成立於1917年（大正6），不

同於島內其他學校，首創先例，以「內臺人共學」成為辦學特色，從人格尊重的角度為出發點，教學目標著重於德育、體育，以及族群融合。¹²⁰自創校以來內臺人學生人數參半，對於臺灣社會實業知能的提升多所貢獻。1938年，伴隨盧溝橋事件的爆發，導致日本社會對華南與南洋相關的實務人才之需求變大，1939年該校之課程規畫朝往商工分流設計，而形成「私立開南商業學校」與「私立開南工業學校」分立的局面。¹²¹

該校創始之際，以培育可往南支、南洋從事工商業活動之人才為其辦學宗旨。¹²²日治時期，有不少該校台裔校友獲選為市街庄協議會議員等地方民意代表。而除了《台灣人士鑑》所收錄的台灣工商界名仕中，不乏該校校友外，¹²³另有龍瑛宗（作家）、王昶雄（作家）、高騰蛟（義美食品創辦人）等社會知名人士亦為該校之畢業校友。事實上，日治時期的畢業校友更成為戰後台灣工商業界的重要領航者。¹²⁴

而「東洋協會」亦承襲「台灣協會」時期之舊慣，提供位在日本本土之「台灣會館」的部分宿舍給台裔學生入宿，亦協助台灣總督府與朝鮮總督府代管殖民地在日留學生之生活起居。¹²⁵1912年（明治45），由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旗下的「學租財團」出資，於東洋協會專門學校之構內，興建150坪兩層木造建築的「高砂寮」，提供台灣留學生住宿之用。初起之

¹¹⁸ 江本旭〈台灣商工學校の創立前後～《台灣時報》を中心として〉（收錄於拓殖大學創立百年史編纂室編《台灣と拓殖大学》，2005年10月），東京，頁104。

¹¹⁹ 〈臺灣商工學校開校式〉（收錄於《臺灣時報》第91號），1917年（大正6）4月25日，見拓殖大學創立百年史編纂室編《東洋文化協會五十年史稿》，頁389-390。

¹²⁰ 前掲〈臺灣商工學校開校式〉（收錄於《臺灣時報》第91號）頁388-396。

¹²¹ 前掲拓殖大學創立百年史編纂室《東洋文化協會五十年史稿》，頁89-91。

¹²² 同注89，頁106。

¹²³ 同注89，頁111。

¹²⁴ 〈培養台灣工商人材的搖籃地—台灣商工〉（收錄於《開南校史》第二章），網址如下：<http://web1.knvs.tp.edu.tw/web/%E6%A0%A1%E5%8F%B2.html>（2013/01/16），2013.01.16。

¹²⁵ Hyung Gu Lynn, "Politics and Knowledge: The Toyo Kyokai's Informational and Political Projects", pp.16-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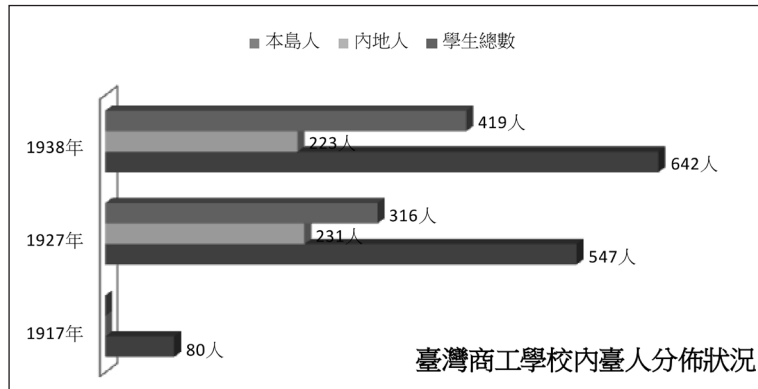
際，由「東洋協會」管理，1927年（昭和2）以後則改由財團法人「學租財團」直接經營、管理。¹²⁶

第二節 「東洋協會」的發展興衰

「東洋協會」之於日本對外關係的全盛期（1919-1929）

（表4）台灣商工學校學生族群屬性人數一覽

年份	學生總數	內地（人數）	本島（人數）
1917年	商工80人		
1927年	商工547人	231人	316人
1938年	商科423人	119人	304人
	工科219人	104人	115人



（作者整理，參照拓殖大學創立百年史編纂室《東洋文化協會五十年史稿》，頁89-91。）

表（5）「台灣協會學校」的轉型與歷任校長

校名	校長	任期	協會會長
台灣協會學校（1900）	桂太郎（第二任台灣總督）	1900-1911	台灣協會會長 桂太郎（1898-1913）
台灣協會專門學校（1904）	全		全
「東洋協會」專門學校（1907）	全		全
「東洋協會」殖民專門學校（1915）	小松原英太郎	1911-1919	台灣協會會長 桂太郎（1898-1913）
			「東洋協會」會長 小松原英二郎（1913-1919）
「東洋協會」大學（1922）	後藤新平（第三任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	1919-1929	「東洋協會」會長 後藤新平（1919-1929）
拓殖大學（1926）	後藤新平 永田秀次郎 大藏公望 宇垣一成 下村宏（第七任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東洋協會」台灣支部長）	1929-1943 1943-1944 1944-1945 1945.11-1946.1	「東洋協會」會長 後藤新平（1919-1929） 水野鍊太郎（1929-1945）

（作者整理，參照Hyung Gu Lynn, “Politics and Knowledge: The Toyo Kyokai’s Informational and Political Projects”, *Tokushoku University History Review*, 1/2 32a-1a, 1999-03-31, p.5 & p.13）

¹²⁶ 前揭拓殖大學創立百年史編纂室編《東洋文化協會五十年史稿》，頁99。

1919年，小松原英太郎過世，經幾位幹事討論後，決定推舉後藤新平成為協會繼任會長，後藤亦欣然接受這項任務的挑戰，並隨即指派水野鍊太郎擔任副手、永田秀次郎接任總幹事。

後藤新平與水野鍊太郎、永田秀次郎等所結構出的三角陣容，促使「東洋協會」在1920年代超越其他文化團體，在政界具有一定影響力。畢竟，1920年代期間後藤新平與水野鍊太郎皆曾入閣；而永田秀次郎則續任兩屆的東京市長，並曾在議會中坐擁席次。因此，後藤新平會長時期乃造就出「東洋協會」之最盛期。

事實上，在1910年代後期乃至1920年代，後藤新平與田健治郎被公認是具有實權的政務官僚與政治人物，即使他們二人最後都沒能成為總理大臣。但以後藤新平為例，後藤習以文化性社團如「東洋協會」、「日露協會」等文化團體，有效掩飾其政治面向，並透過月刊《東洋》等，成為其之於對外思考的後盾。以1923年後藤新平與蘇聯副外長越飛（Adolf A. Joffe）的會談為例，其目標是促成1925年日蘇關係正常化，而在此之前便經常透過協會雜誌發表各種與蘇聯相關之論點或談話。

1918年（大正7）後藤新平曾擔任外務大臣，但其後在任職協會會長期間，即使他曾擔任過東京市長（1920-1923）與內務大臣（1923-1924）等，卻沒有身兼任何與外交事務相關之職務。然而，憑藉後藤新平的個人魅力與所屬文化團體之平台，在加藤友三郎首相認可下，後藤新平仍可顧周遭反對，而與蘇聯代表越飛繼續進行交涉。

而除了「日露協會」之外，與後藤新平有裙帶關連的「東洋協會」亦之於這些負面批判，扮演緩衝與靠山的角色。相關的文化團體透過媒體，找幾位社會名仕有效表達支持後藤新平之於對外方針的思考。同時，月刊《東洋》亦刊載了不少蘇聯在遠東地區的天然資源，抑或是預期蘇聯革命完成後，日蘇關係正常化將有

多少潛在的經濟效益可資發揮等訊息。而這些日蘇貿易與相互提攜等正面性探討，必然對後藤新平之於蘇聯外交的思考多所助益。

就整體而言，後藤新平與文化團體的關係亦非呈一言堂之局面，例如戰前的農學者東鄉實經常在「東洋協會」的出版物上發表高見，而他可謂是之於殖民統治問題，少數主張台灣人自治之一位。

鑑於1924年國際社會充斥著亞洲即將崛起的種種表徵，除了思考對蘇關係正常化的問題外，後藤新平對美國之於日本的殖民政策與對外方針等相關議題，亦多所注意。「東洋協會」中的幾位會員針對英、美社會的種族主義與傲慢態度，尤以針對當時日本外務大臣石井菊次郎之於北美社會的反亞洲人主義者之問題意識與因應態度，提出嚴厲批判。

另一方面，後藤新平亦試圖以其個人影響力，提升「東洋協會」之發展能量。例如，利用糖業公會資金補助拓殖大學之營運；抑或是從台灣總督府獲取金源，資助特殊的特殊研究；甚至邀請田健治郎、石塚英藏、內田嘉吉等政界要員來到自宅，大談自己之於對外關係的遠大理想，意圖尋求有力者的支持與協助，而這些人不乏台灣經驗者。

事實上，田健治郎、內田嘉吉等，既是「東洋協會」會員，同時亦身兼「南洋協會」的會長與副會長。依加拿大UBC大學韓裔東亞研究者Hyung Gu, Lynn氏之所見，內田嘉吉則因加入「東洋協會」與「南洋協會」而得以與後藤新平、田健治郎等人接觸，亦才有機會擔任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甚至成為總督。事實上，身處於階級社會日本，政治人物間的群帶關係時有所聞，例如田健治郎的女婿安場保健，乃後藤新平妻舅安場末喜之子。因此，無論Hyung Gu, Lynn氏之見，正確與否，近代日本部分的政務官僚是透過文化團體之參與，而得以獲取職務昇遷機會，亦是合理推論。

但不容諱言地，後藤新平之於對外方針的理想，光憑其個人的人際網絡，亦不一定會有所成就。事實上，後藤之於關東大震災之後的首都再造，乃至於西伯利亞出兵的金源問題等，都因欠缺資金挹注，導致魂回夢碎；又，後藤新平喜好結合產、官、學界力量，透過大型研究機構推動某些偉大計畫，在加藤友三郎內閣時代他設計了不少藍圖，但卻不被內務大臣水野鍊太郎所認同。換言之，後藤新平即使擁有豐富的人脈關係，但在欠缺資金奧援下，還是無法完成夢想。¹²⁷

「東洋協會」之於日本外交影響力的下滑（1930-1945）

1929年，後藤新平過世。水野鍊太郎繼任會長，而永田秀次郎則擔任副座職。

1920年代，永田秀次郎因擔任協會的執行幹事，因此在協會所舉辦的講習活動中相當活躍，但卻不見於副會長水野鍊太郎的身影。直到1929年水野自己擔任會長之後，才在永田的陪同下，參與這些講習性質的活動。

然而，水野鍊太郎會長的時期並沒有承繼以往後藤新平會長時期的既定方針，而政界的紛紛擾擾，亦損及水野鍊太郎之於社會大眾心中的份量與形象，「東洋協會」在其任內逐漸呈現衰勢。

然而，當水野鍊太郎個人低迷的聲望，間接影響「東洋協會」的整體形象時，反觀副座永田秀次郎不僅擁有內閣閣員身分，更具高人氣。1930年代，永田副會長在廣田弘毅內閣中擔任拓殖大臣（1936-1937）；又在其後的阿部信行內閣中擔任鐵道大臣（1939-1940）。換言之，即使永田秀次郎欠缺1920年代後藤新平或

水野鍊太郎所擁有的魅力或實力，但以往永田個人在「東洋協會」的活躍性地位，早已超越他是後藤或水野繼任者的身分。

回顧過去，在1930年代以前，「東洋協會」之主事者經常透過政府閣員或民間實業界，有效獲取各種資源。然而，1920年代後期乃至1930年代初期，不少可提供資金之企業主，如大日本麥酒的馬越恭平、實業家涉澤榮一、淺野總一郎、大倉喜八郎等皆相繼過世；而1941至1945年的太平洋戰爭期間，受制於軍部，「東洋協會」更是毫無作為，僅專注於區域研究，而無法有效展現其應有的獨立自主性。物換星移，即使巡迴講習與展覽活動依舊繼續，但「東洋協會」內部狀況之轉變與大環境的變化，導致該會之於政界的影響力亦逐步走上衰途。¹²⁸

小結

日俄戰後，因有效獲取遼東半島的租借權，並把鄰近的韓國納入「保護」之下，日本社會海外進出的方向明顯朝往亞洲大陸，蠢蠢欲動，亦成為「台灣協會」改組為「東洋協會」之契機，「東洋協會」規約第一條開宗明義寫著，「本会は東洋における平和文明の事業を裨補するを以て目的とし台湾韓国及滿洲に於ける諸般の事項を講究し以て彼我の事情を疎通し相互の福利を増進するを務むるものとす」，¹²⁹當時的社會充斥著一股「北進」的氛圍¹³⁰。

然而，1914年（大正3）歐戰爆發，帶動了亞洲社會的歐戰景氣。為能有效取得原料，日本社會再次從經濟的考量出發，社會上

¹²⁷ 前揭Hyung Gu Lynn, "Politics and Knowledge: The Toyo Kyokai's Informational and Political Projects", pp.17-20.

¹²⁸ 前揭Hyung Gu Lynn, "Politics and Knowledge: The Toyo Kyokai's Informational and Political Projects", pp.20-22.

¹²⁹ 〈東洋協會趣意書並びに規約〉（收錄於台灣協會《台灣協會會報》第百號，1907年1月20），東京，頁2。

¹³⁰ 前揭河原林直人〈東洋協會における南洋への関心について：1910年代を中心に〉，頁5。

下瀰漫著一股「南進」風潮。以進出南洋地區為目標，而造就出所謂「大正南進期」時代的來臨。此時在「南へ」的社會氛圍下，一個象徵性社團於焉成立，即創立於1915年（大正4）的「南洋協會」，而這個協會一如前例，亦以「文化團體」的模式，試圖擔負起日本帝國南進的先鋒。¹³¹

即使「東洋協會」的思考一度是西進發展，但面對日本國內社會情勢的轉變，「東洋協會」的發展方向亦必須做一局部調整。而一項最令人矚目的改變，莫過於協會之於人才培育的事業內容上。1915年（大正4）8月，協會旗下的事業之一，即由原「台灣協會專門學校」所改稱而來的「東洋協會專門學校」，被改名為「東洋協會殖民專門學校」，而其學則第一條開宗明義寫著「本校ハ台湾、朝鮮及支那其他南洋ニ於テ公私ノ業務ニ從事スル必要ナル學術ヲ授クルヲ以テ目的トス」。事實上，除了把南洋地區重新納入既有之人才派遣的射程範圍，更於1917年4月（大正6）聘任有熱帶產業知識的新渡戶稻造擔任學監。¹³²翌年（1918），「東洋協會殖民專門學校」升格為「拓殖大學」後不久，便聘任後藤新平會長兼任該校校長。『東洋協會』以學校營運為始，乃至協會旗下重要幹部與會員，不乏「台灣經驗」者。

1913年（大正2）「東洋協會」副會長小松原英太郎在第15次總會的致詞，¹³³同年內田嘉吉在協會舉辦的通俗演講會中，1916年（大

正5）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下村宏在「南洋協會」台灣支部的成立大會上，¹³⁴皆不約而同地強調台灣扮演著日本與南洋之間踏腳石的角色。即使後來「東洋協會」之於南方的參與並不多見，以現存「東洋協會」的相關調查報告顯見，「東洋協會」的意識主軸多在滿蒙、朝鮮半島、中國、蘇聯等北亞地區，偶有旁及台灣、海南島、大東亞或全亞洲等議題出現。¹³⁶

1919年（大正8）10月12日，田健治郎以台灣總督之身，來台履新不久，隨即發表治台方針之大綱，內容強調「(略) 海外との經濟貿易の關係を觀察せば、台湾天与の地勢は南北交會の要衝を占め、南支南洋等一筆帶水にして、相隣するあり、人事の交渉亦頗る密接するものあるに依り、善く之を利用して、交通貿易の途を疎通せば、自他の便益を増進し、相互の慶福を伸暢すること頗る大なるものあるべし」，¹³⁷在這篇田總督之於台灣統治的訓示內容中，亦清楚點出台灣之於東亞的定位。

即使後來「東洋協會」之於南方的參與並不多見，但很顯然地，在一股「大正南進期」風潮下，進出「南方」乃「東洋協會」的遠程目標，而這目標多數時候則委由「南洋協會」辦理，畢竟協會會員中有不少是同一人但分屬兩個不同的文化團體。¹³⁸以田健治郎、內田嘉吉等人為例，兩人既是「東洋協會」會員，亦同時身兼「南洋協會」的會長與副會長。¹³⁹

¹³¹ 前掲河原林直人〈東洋協会における南洋への関心について：1910年代を中心に〉，頁7。

¹³² 前掲河原林直人〈東洋協会における南洋への関心について：1910年代を中心に〉，頁7。

¹³³ 前掲河原林直人〈東洋協会における南洋への関心について：1910年代を中心に〉，頁8。

¹³⁴ 前掲河原林直人〈東洋協会における南洋への関心について：1910年代を中心に〉，頁9。

¹³⁵ 前掲河原林直人〈東洋協会における南洋への関心について：1910年代を中心に〉，頁12。

¹³⁶ 参照日本「近代デジタルライブラリー」所藏東洋協會調查部出版之專書目錄，網址如下：<http://kindai.ndl.go.jp/search/searchResult?searchWord=%E6%9D%B1%E6%B4%8B%E5%8D%94%E4%BC%9A%E8%AA%BF%E6%9F%BB%E9%83%A8&rows=100&sort1=5&sort2=0> (2002/04/01) 2012.09.04.

¹³⁷ 「田總督の台灣統治に關する訓示」（收錄於《台灣時報》1919年12月號），1919年12月。

¹³⁸ 前掲河原林直人〈東洋協会における南洋への関心について：1910年代を中心に〉，頁11-12。

¹³⁹ 前掲Hyung Gu Lynn, "Politics and Knowledge: The Toyo Kyokai's Informational and Political Projects", p.20.

一如前述，1920年代文化團體「東洋協會」在後藤新平會長領導下，一度展現出前所未有的隆盛景象。1922年（大正11），後藤新平以一篇〈新轉機に立つ植民政策：附・東洋協會の新使命〉為題，刊登在《東洋》第25年第1號，強調當海外世界的殖民主義朝往「一視同仁」的方向進展時，日本的殖民主義亦必須與時俱進，以「文化政策」替代殖民主義，然而日本社會眼前所面臨的卻是「原料不足」的隱憂，如何有效摒棄過去「征服主義」的殖民主義，而改以更始一新的新殖民主義，則是東洋協會最大的目標與責務，唯仰賴協會會員以科學的調查與研究，協助解決日本的困境。¹⁴⁰

針對東洋協會的角色扮演，加拿大UBC

亞洲研究所學者Hyung Gu, Lynn歸納出以下幾項特質：

- (1) 該協會充分展現出這是一立基於人際網絡，且跨組織之菁英聯盟，並直屬於內閣層級之下，替政府思考人事派令。
- (2) 透過對海外資訊的有效掌握，協會成員對政府的政策設計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
- (3) 協會為社會各界與政府官僚提供了政黨之外，另一個可與政經界領袖接觸的平台。

「東洋協會」透過資訊網絡的提供，即使無法有效建立決策共識，但卻提供各界與政治領袖相互溝通的一個管道，而這也是文化團體之於近代日本一項重要的角色扮演。¹⁴¹

表 (6) 影響「東洋協會」發展走向的關鍵年代

關鍵年代	影響「東洋協會」發展走向的歷史背景	對「東洋協會」的實質影響
1907年	1. 1905年日俄戰爭獲勝，日本社會對海外進出的期待，明確朝往亞洲大陸。 2. 英屬加拿大溫哥華地區「亞細亞人排斥同盟會 (Asiatic Exclusion League)」以「White Canada」為訴求，進而引發反亞裔移民之暴動。	從原「台灣協會」轉型為「東洋協會」。
1917年	1914~1918年歐戰期間所帶動的亞洲景氣，醞釀出「大正南進期」的熱潮。	「南進」成為「東洋協會」的遠程目標。
1924年	1. 土耳其共和國、蒙古人民共和國相繼成立。 2. 英國、義大利等國正式承認蘇聯政權。 3. 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發表「聯俄容共」、扶持工農之路線。 4. 中國的孫文在日本神戶發表「大亞洲主義」。 5. 「東洋文庫」成立，象徵東洋國家今後相互提攜、共存共榮，更是落實明治時期「興亞論」概念的表徵。 6. 美國政府通過新的移民法，又稱之為「Johnson-Reed Act」，以反亞裔移民為訴求，連帶引發舊金山地區一股反日本人學校開設之浪潮。	「東洋協會」會長後藤新平力促1925年日蘇關係正常化。
1936年	1. 1936年8月7日，廣田弘毅內閣五相會議中確立對南洋的經濟進出。 2. 1936年9月，台灣總督府小林躋造總督提出「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之治台方針。	自此以後，受制於軍部，僅專注於區域研究，無法有效展現獨立自主性。

(作者整理，參照東京學藝大學日本史研究室編《日本史年表》繪製)

¹⁴⁰ 後藤新平〈新轉機に立つ植民政策：附・東洋協會の新使命〉(收錄於《東洋》第25年第1號)，1922年（大正11）1月20日，見前揭拓殖大學創立百年史編纂室《東洋文化協會五十年史稿》，頁334-338。

¹⁴¹ 前揭Hyung Gu Lynn, "Politics and Knowledge: The Toyo Kyokai's Informational and Political Projects", pp.21-22.

結語

人類歷史進入二十世紀以後，伴隨1914年（大正3）歐戰的爆發，歐美各國之於南洋的貿易關係變得無暇他顧，而這個現象直到1920年（大正9）以後才逐漸恢復。值此期間，乃帶動起日本民間另一波往南洋發展的風潮，即所謂「大正期南進論」時代。但這股南洋熱潮卻因國際橡膠價格的滑落，導致南方發展陷入空窗期，「北進南守論」再次起而代之。¹⁴²直到1936年（昭和11）以後，從原料與資源取得的角度，以及對美問題的解套上考量，當時日本政府決策者乃重新意識到「南進論」的問題思考。¹⁴³

「東洋協會」乃戰前日本社會一個有效傳播亞洲意象與情報資訊的代表性社團，透過該協會的海外教育事業，亦把近代化概念與資本主義價值等有效散布至東亞各地，並藉機強化日本之於這些鄰近區域的影響力。

一如前述，因應時局之變化，日俄戰後「台灣協會」改組為「東洋協會」。而從「東洋協會」之存立，依經濟學者河原林直人之研究指出，近代日本社會文化團體之內涵有三：其一，文化性社團雖屬非政府組織，但卻是政、官、軍、民等各界有力者之結集，協會內部成員可謂是社會輿論之意見領袖；其二，雖美其名為「文化團體」，但近代日本社會的文化性社團卻具備海外情事等「特殊」情報收發信源之機制；其三，包括日本殖民地支配等對外膨脹之策略規劃，近代日本的文化團體經常有其特定的角色扮演。¹⁴⁴

文化團體之於日本近代史上的角色扮演

根據加拿大UBC亞洲研究所學者Hyung Gu, Lynn之研究認為，近代日本社會透過各

種文化團體有效獲取來自東亞之相關情報，包括政府外館的研究報告、外地殖民當局的調查報告、有官方資金挹注的民營事業機構（如朝鮮銀行、台灣銀行、南滿鐵路株式會社、東洋拓殖會社等），以及各種商會、工業團體、財閥企業所提供的資訊情報。

而大學則聘僱許多的東亞專家，其中有不少曾任職於殖民政府或相關之研究機構，例如滿州鐵道株式會社附屬之地理歷史調查部等單位，而東京帝國大學、國學院大學、早稻田大學等校，諸如此類的專家舉目可見。位處外地的京城帝國大學、台北帝國大學亦聘僱不少這類專家任教，他們對殖民地的相關議題皆有精闢見解。至於其他獨立的研究機構，如1924年成立的「東洋文庫」，亦是提供亞洲研究的一個重要場域。

即使這些訊息或研究成果是出自於不同機構或學者專家之手，但多半時候卻是經由人脈網絡傳播出去。各種關連亞洲的資訊透過各類管道，並從各相關機構或官僚體系流入政權者手中。相對地，沒有公職或政黨以為奧援者，則超越職務與黨派，以正式或非正式型態有效獲取相關資訊。其中，最常見的莫過於以「財團法人」或「社團法人」等模式，把官僚、政治人物、工商界人士、學者等結集在一起的非營利團體。而這些團體在政府的決策過程中，的確發揮不同程度的影響力。

諸如此類的團體在1910年代與1920年代的日本社會不斷增生，其間不乏在執政者主導下，依區域特殊性而成立的非政府組織，如「朝鮮協會」、「東方協會」、「殖民協會」、「黑龍會」、「南洋協會」、「中央朝鮮協會」、「日露協會」、「日印協會」、「日蘭協會」、「菲律賓協會」、「日滿實業協會」等，這些社團在有限的會員與資源下，藉由相關出版品、研究調查、

¹⁴² 前掲上野隆生〈近代日本外交史における「北進」と「南進」〉，頁113-114。

¹⁴³ 前掲上野隆生〈近代日本外交史における「北進」と「南進」〉，頁114。

¹⁴⁴ 河原林直人〈東洋協会における南洋への関心について：1910年代を中心に〉，頁2。

教育活動等，吸引更多的會員加入。然而，各社團之間會員則多具重複性。而多數的文化團體所擁有的資源是不具設立學校的能耐，但亦有少數諸如「日露協會」、「南洋協會」等社團，則以不定時地舉辦培訓課程替代之。¹⁴⁵

「東洋協會」可謂是近代日本之於亞洲資訊收集上的創造者與運用者，該協會意圖超越政界官僚層級，另樹立一政策設計的權威性場域，並透過出版品、調查資料、課程講習、文物展示、教育機構的設置等各類管道，試圖把相關之情報資訊傳播開來，透過各類計畫案的承接，有效擴大與政界、財經界接觸之界面。而協會所提供之相關訊息，多立基於「在地」觀點，意圖區隔與官僚或學者之間的問題認知。

「東洋協會」透過人際網絡而扮演跨組織之媒介角色，協會之於政治議題的討論，則致力展現出無關政治、無關政黨、無關政府的特質，僅是桂太郎或後藤新平之後援團體。然而，協會會長即使沒有政治頭銜，仍可在國家的對外方針上運籌帷幄。¹⁴⁶

「東洋協會」的啟示

「東洋協會」源自於水野遵奔波下所成立的「台灣協會」，因日俄戰爭的獲勝而組成。初起之際，或許僅是一些台灣經驗者的聯誼會，甚至是會長個人的政治後援會，與會人員的思考亦可能流於桌上之空談泛論。然而，伴隨日月推移，協會會長的人脈與思惟，可藉此而形成集體共識，甚至有效影響政府之於對外關係的政策設計。

1907年、1917年、1924年、1936年是之於「東洋協會」轉型的幾個關鍵年代，深刻影響

其後「東洋協會」的發展走向；而協會的發展方針更與近代日本「北進」策、「南進」策思考緊密相結。

而在「東洋協會」的發展過程中，作為帝國南門的台灣，則不斷地在「南門鎖鑰」與「南方前進基地」等兩種不同角色的扮演中，左搖右擺。以設立「台灣商工學校」一事為例，即使台灣社會乃奠定「東洋協會」發展之基礎，當該協會台灣支部成立時，副會長小松原英太郎的祝辭亦強調「台灣其者は協會發展の第一礎石たりし也、從て東洋協會なるものは台湾の事に最も多くの力を尽くし、最善の注意を払わざる可らず」¹⁴⁷，本應飲水思源，對台灣社會的需求竭盡完善之照護。然而，在前述「台灣商工學校」的設立問題上，時任會長的小松原英太郎在「北方經營」之思惟下，顯然忽略了台灣之於日本的重要性。

1932年滿州國成立，強烈引發歐美強權對日本之於中國的領土野心深感疑懼。1936年，當時的廣田弘毅內閣為化解來自海外社會的疑慮與誤解，乃透過內閣會議強化對蘇聯政權的「防共」方針與南方「資源」的和平取得等兩項國策，意圖轉移各方關注之焦點，亦因而造就出其後台灣總督府小林躋造總督所提的「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之治台三方針，重新凸顯台灣乃「南方前進基地」的角色，頓時讓長久以來一味地固守「北進南守」論者一計當頭棒喝。¹⁴⁸

然而，「東洋協會」無論是人力或資源皆立基於「台灣協會」，而「台灣協會」的成立宗旨是要讓那些「不識所向之輩」，深切理解台灣之於日本帝國的正向意義，乃可固守，亦可威遠。透過對「東洋協會」發展經緯之研

¹⁴⁵ 前揭Hyung Gu Lynn, "Politics and Knowledge: The Toyo Kyokai's Informational and Political Projects", PP.3-4.

¹⁴⁶ 前揭Hyung Gu Lynn, "Politics and Knowledge: The Toyo Kyokai's Informational and Political Projects", PP.22-24.

¹⁴⁷ 小松原英太郎〈祝辭〉(收錄於《台灣協會會報第一百號》，東京)，1907年1月20日，頁5。

¹⁴⁸ 前揭上野隆生〈近代日本外交史における「北進」と「南進」〉，頁114。

究，可以確知無論時代如何地轉變，只要世界地圖所繪之地形、地貌沒有改變，一如〈設立台灣協會主意書〉所強調的，台灣之於日本，「台灣之地也，(略)千海千陸，產物豐饒，內足而可給於外，此天放之形勢，可以固近，可以威遠，誠東洋之咽喉，實我南方之富源也」；¹⁴⁹而台灣之於東亞，即回歸「台灣協會學校設立趣意書」之所載，「台灣之地西控支那大陸，南望南洋諸島」！¹⁵⁰畢竟台灣位處於

西進與南進之門戶，而這亦是1908年（明治41）沖繩社會嚴正反對「南洋道廳」之設置，恐遭「喧賓奪主」其隱憂之所在。

（付記：感謝拓殖大學創立百年史編纂室編纂委員長谷部茂教授惠賜珍貴資料《東洋文化協會五十年史稿》與《拓殖大學百年史：明治編》，以利本稿之撰寫，特此致謝。）

〈作者略歷〉

林 呈蓉（りん ていよう）

1961年 台北市生まれ、雲林科技大学助教授、中国文化大学助教授、淡江大学助教授を経て、教授。現在 淡江大学歴史学科教授、博士（人文科学）、主な著書 林呈蓉「近代国家的模索與覺醒：日本與台湾文明開化的進程」（2005年 財団法人台湾吳三連史料基金会出版）、林呈蓉「牡丹社事件的真相」（2006年 博揚文化出版）、林呈蓉「皇民化社会的時代」（2010年 台湾書房出版）、林呈蓉「水野遵：一個台湾未來的擘畫者」（2011年 台湾書房出版）林呈蓉「台湾涉外關係史概說」（2015年、五南圖書出版）。

¹⁴⁹ 參照前揭台灣協會誌〈設立台灣協會主意書〉（收錄於《台灣協會會報》各號刊頭，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藏）。

¹⁵⁰ 「(略)台灣之地西控支那大陸，南望南洋諸島，不獨是通商貿易的策源地，其陸所產、其海所藏，若能開乎，則內養三百萬眾，外足充四鄰之需，真可謂是帝國重鎮、南方寶庫，(略)」參照前揭〈台灣協會學校設立趣意書〉（收錄於《台灣協會會報》第二十一號），1901年6月20日，頁80。